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97

所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 内部读物 ·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0.60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3}{8}$ ·字数 97,000

1964年9月第一版 1964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47

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編譯

(已出下列各辑)

古希腊罗马哲学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

新华书店发行

一九六五年 四月 十七日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今年 3 月，已經知道有五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党员，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领导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意大利共产党自 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1964 年 3 月的材料，共計十七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路易吉·隆哥在米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全省大会上的演說， 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結問題·····	1
路易吉·隆哥，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会談·····	5
意共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26 日會議通过的第二項決議： 让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革新原則 的基础上前进·····	12
賈恩卡洛·巴叶塔在意共中央 1963 年 7 月全会上 的报告·····	15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我們將前进，我們將不后退·····	3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团結与辯論·····	37
馬里奧·阿利卡塔： 关于中国的信件·····	4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关于禁止原子爆炸的协定·····	46
馬里奧·阿利卡塔： 关于中国的另一些信件·····	5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反对教条主义，爭取馬克思主义的政策·····	56

朱利亚諾·巴叶塔:	
关于某些捏造.....	62
魯契亞諾·格魯皮:	
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65
附: 格魯皮給意大利《再生》周刊的信	70
意共中央 1963 年 10 月 24 日會議決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进展和团結.....	72
朱塞佩·博法:	
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貿易情况.....	103
路易吉·隆哥:	
苏联共产党的斗爭的世界作用和意义.....	107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在南斯拉夫的訪問.....	127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五次全国會議上的講話(节譯).....	132

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 的团结问题

路易吉·隆哥在米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
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全省大会上的演说

隆哥开始时驳斥了中国同志们的这些说法：他们说他们始终希望通过直接的磋商解决各党之间的分歧；始终反对“把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由于某些兄弟党领导人的态度而被迫进行公开论战。实际上，事情并不是如此，中国同志长期以来进行着影射的论战，这就引起了混乱，使得无法明确地确定责任，使得回答很难，因为回答也必须玩弄字眼和用晦涩的提法。而且，当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在1960年八十一个党会议之后采取明确态度时，情况还是如此。

关于苏联提出的停止攻击和论战的建议，中国同志始终是在口头上支持，但以后总是继续执行同样的路线，加强他们的谴责，从而使分歧公开在所有人的眼前。因此，工人党内有必要展开一次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明确的辩论，这一辩论应民主地和本着负责精神来进行：这是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所选择的道路，我们认为我们是以最好的方式采取了行动。

这只不过是有关是谁开始论战的问题，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重要得多的是，中国方面以尖刻、敌视的语调进行了辩论。

中国同志突出之处，是他们的谴责很严重，往往变成了纯粹的诽谤，侮辱兄弟党的领导人，忘记了尊重别人和兄弟友谊的一

切意义。而苏共作回答和我們作回答时所用的語調，則始終是大不相同的，是怀着尊重和尊敬的。

語調的不同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人們对待这些問題不同的精神状态，但也表明了对于希望达到的結果的不同考虑。赫魯曉夫同志几次提出停止論战。中国同志仅仅支持举行一次会談的建議，但是同时，他們拟訂了著名的供討論用的“二十五点”信件，这是一份以进攻性和誹謗性的語調編写的真正的起訴书。更严重的是，在已經召开的會議討論这“二十五点”之前，它便已被譯成各种文字发表了，送往了所有的国家。因此，中国同志怎么能說他們“始終反对把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呢？

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同志們还企图在各党内掀起旨在要求不待苏联答复就公布和立即討論“二十五点”信件的运动；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因为这封信是致苏共的，也因为它的譴責是严重的；在答复的同时发表这封信的做法，才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这同不容許进行可能破坏兄弟党之間团结的一切行动的八十一个党會議的決議，怎么能相容呢？正如人們看到的，中国同志相反是在进行一种派别活动，我們在意大利也有过这种例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6月14日发表的，过了不几天，一夥情况不清楚的同志給我們的組織散发了一封信，信里指責党的领导人不要发表中国的文件。这封信是在北京編写它的文件之后十天散发的。显然这封請願书的作者是了解这种情况的，至于我們，即使我們当时願意发表这“二十五点”信，也不能发表，因为我們沒有任何抄本。人們从未給我們寄过，直到昨天，我們弄到的一份还是我們不知道是否确切的英文稿。

中国同志为了他們的派别目的，利用了与意共无关的、被开除或从未入过党的人，这些人是随时准备进行一切挑畔嘗試的。中国同志說，他們希望同“意共党内或党外”的所有馬克思列宁

主义者进行接触；事实上，他們表明，照他們来看，意共不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組織。中国同志自以为有权决定哪一个党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哪一个不是，而不管这些党的历史、它的斗争，好象一切都是从今天才开始似的。

于是，隆哥談到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进行的一项具体的指責：指責它不发表中共的信，因为这封信“燙人”，因为它包含着我們不能反駁的指責，因为人們想阻止在党内进行的自由討論。隆哥說，这是目的在于瓦解我們的队伍的无根据和別有用心的論据。說它无根据是因为，恰恰是我們党曾經主张进行最广泛的討論。意共曾发表了八十一个党會議上的各个发言，曾不顾《人民日报》的指責的分寸和它的誹謗性质而发表了它攻击陶里亚蒂同志的文章全文，并且发表了关于正在进行辯論的問題的小册子。至于“二十五点”信件，我們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报道了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但当我們得到这一文件时，出于政治原因，我們沒有立即单独发表中国同志的信。虽然我們不对正在进行的莫斯科会談可能达成的結果抱有幻想，但我們不願意——甚至在会談开始之前——增添这样一个虽則微小但却可能妨碍会談发展和取得結果的因素。此外，我們认为，把中共的指責同苏共的答复同时发表，以便同志們能掌握全面材料，是正确的。

隆哥說，同志們現在了解了爭執的基本点是：（1）避免战争、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2）各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遵循的革命发展道路。1960年在莫斯科已經研究了这两个問題，中国同志也同意了有关的決議，然而今天他們却指責苏共和其他党不忠于当时的決議。譬如，八十一个党決議說：“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合理的原則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現在，中国同志不否认这一提法，却指責人們根据这一路綫所作的事情。还有，八十一个党決議說：“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

免的”，中国同志不对执行这一政策中发生的具体事实进行深入研究，反而指責全部政策是“幻想”，他們把它看作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此外，中国同志說帝国主义是“紙老虎”，但他們却又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低估了和平的力量。

所有的同志还知道一些对我们党进行的指責：进行改良主义的抱幻想的活动。事实上，我們反对垄断組織和建立一个新的历史性集团的政策，是符合莫斯科決議的路綫的，因为決議指出，反垄断資本斗争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首要任务，決議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不认为，革命道路应当經過战争”。选择这种或那种社会秩序是“每个国家人民的不可轉让的权利”。

隆哥最后說，尽管有爭执和这种爭执所达到的激烈程度，但我們深信，目前的形势能够而且应该得到克服，因为团结我們的东西無論如何比目前分裂我們的东西更要强大和重要。也許我們应当本着責任感在尽可能尊重每个党自主的情况下找到各党之間团结的新形式，作为首先要求放弃领导国和领导党理論的我們，是格外重視这种責任感的。在各党之間和各个党内負責任、民主和交流思想，就是一条道路，沿着这条路就能向着維護和巩固团结的方向前进。

（譯自1963年7月16日意大利《团结报》）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的会谈

路易吉·隆哥

当人们宣布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于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歧时，所有共产党人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心目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希望。

不幸，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还在会谈前夕，中国同志就不是把有分歧的问题留待这次会谈时讨论，而是重新公开地、更加激烈地提出了他们的指责，特别是针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并且在他们中间加紧进行不可容许的分裂活动，把包括所谓二十五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加以发表并在各国散发，使这种活动达到顶点。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苏联同志最初认为，不发表这封信是有益的。因为信里所包含的指责的严重性需要给予回答，而要是回答就不能不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分歧，并且不利于莫斯科会谈本身；另一方面，这次会谈恰恰是处理那些提出来的问题的最好和最适当的场所。我们党也是这样看的，它没有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中国的信件，因为它打算用这种方法来重新表明它的如下立场：不管怎么样，分歧能够而且应该由党的代表通过正常的讨论途径并且根据1957和1960年莫斯科国际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来处理。

预定的苏联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的会谈在7月5日开始。

不幸，直到現在所得到的关于两个代表团会談的消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更加耐人寻味和令人不安的是，苏联同志原来宁願不立即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和它自己的答复，然后又认为可以在两个代表团会談期間发表这两个文件。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說明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同志失去了可以至少在目前获致某些积极結果的任何希望。

大家知道，中国同志是在哪些問題上进行尖刻的攻击的。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問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問題，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关于这些問題，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两次国际會議上进行了广泛和深刻的討論，并且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中国同志也在結論上签了字。此后，每一个党，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通过各自的研究和創造工作，努力来丰富和在实际上执行这些总的結論。至于我們，我們认为，我們在这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根据集体确定的总方針，制訂并且深化了我們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中国同志在签署了莫斯科国际會議的結論之后，現在不敢正式推翻这些結論，相反却硬說他們自己是遵循这些結論的，但是他們歪曲这些結論的真实意义，并且事实上他們只是重申我們的运动在其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所制定的一般方針和原則，而不考虑現时代的特点。他們以同样的方法只是列举工人階級最共同的任务，并且把这些任务同每个运动的特殊任务对立起来，而不去考虑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現有的力量对比，同其他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建立联盟的現實可能性，并使眼前的和遙远的斗争目标与之相适应。

中国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們在对原則、方針和共同決議冠冕堂皇地表示尊重之后，接着事实上就加以否定，他們譴責对这

些原則、方針和共同決議的任何實施，把這種實施誹謗為“出賣”世界革命的利益，“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甚至“發現”一些有巨大的不容置辯的革命功績的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人對帝國主義的所謂效勞。從這樣任意把理論和實踐割裂、把一般和具體割裂出發，中國同志認為可以由他們徒勞無益地用重復革命詞句和一再表示革命意向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和教導以及這些原則和教導所啟示的國際決議的正確運用，而他們一點也不懂得把革命詞句和革命意向真正地同有待改造的現實聯繫起來。

蘇共二十大以及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兩次莫斯科會議，從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出發，在現實地估計了世界力量的對比之後，得出如下的結論：雖然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發生戰爭的危險並沒有消除，但是由於熱核武器能毀滅整個洲，考慮到一場原子戰爭對任何發動原子戰爭的人和被卷入這場戰爭的人所具有的自殺性質以及國際上業已改變的新的力量對比，這種危險是能夠而且應該避免的。

目前的國際新形勢，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和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外交行動來加以利用，並通過群眾的鬥爭來迫使帝國主義接受和平共處政策，這種政策事實上將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得到另一種安排，把戰爭排除於國與國之間競爭手段之外，並為各國人民在和平中走向民族和社會的徹底解放提供種種新的可能性。

蘇聯一貫竭力堅持奉行這一保衛和平與和平共處的政策，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奉行這一政策，而中國同志特別把這種政策作為攻擊對象。他們認為，這種政策只是幻想，而且是革命鬥爭的障礙。他們不相信有可能束縛帝國主義集團、防止它們發動一次新的世界大戰。這樣，他們就表明他們過高估計帝國

主义的力量——尽管他們在“紙老虎”的問題上大談特談，过低估計工人和人民力量的動員和斗争的可能性——尽管他們为了論战的目的对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頌揚备至。对中国同志來說，原子彈似乎也是“紙老虎”。他們說，原子彈是毫不可怕的。無論如何，即使在这样一場战争中，胜利的将是各国人民，而且他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将会創造出比資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

我們认为，这种意見不仅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根本背道而馳的，而且是任何劳动人民和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所絕對不能接受的。某些最猖獗的帝国主义集团甚至可能瘋狂地訴諸原子武器，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将有一切权利，甚至在帝国主义者所选择的这个方面，予以最坚决和最沉重的回击。但是，肯定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职责是不忽視任何事情，以便不致于达到这种地步；相反地，他們的职责是竭尽所能来使这样的情况永远被排除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之外。

鉴于意大利的形势和我們斗争的要求，我們認識到，共处政策和緩和局势政策不仅應該是意大利国际政策的基础，而且應該是我們国内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利于和平和緩和的事情，也有利于我国的民主发展，促进人民朝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前进。我們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观点，我們为爭取劳动人民的社会和經濟利益、为爭取实现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正是从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的这一認識出发的；应当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主改革，这种改革在改善工人階級、农民和小資产階級各阶层的生活条件的同时，有助于建成反壟断的广泛战綫，从而能从事繼續不断的斗争，力求对国家进行革新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加以改造。当然，只有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才能实现我們的政治路綫，这就是我們全部思想的坚定不移之

点,这不仅載明在我們的文件中,而且体現在党的全部日常具体活动中。

中国同志正是反对我們的这个观点,他們歪曲我們的經典著作的原則和学說,无視莫斯科的各项決議,甚至不想了解我們党进行斗争的具体条件,并且对我們发动了极其刻薄和毫无道理的指責,硬說我們是机会主义,是放弃革命斗争。他們以革命的名义譴責在我們的具体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把我們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他們提出的那种政策会使我們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丧失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联盟,而只有这种广泛的联盟才能使工人阶级展开和胜利地推进反对垄断資本集团統治和資本主义的斗争。

关于中国同志在我們同他們有分歧的理論、政策和行动問題上进行的其他各种指責和誣蔑,我們可以作同样的論述。中国同志对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段落妄加推論、断章取义和作出錯誤的解釋,据此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包含的主要論点对立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各党的内部进行分裂活动。

目前,他們特別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运动和党下功夫。他們甚至硬說,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不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矛盾。中国同志认为,这样提出問題,就能够对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施展影响。但是,如果接受了中国同志的这种立場,那么只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之外——既孤立于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之外,又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之外。然而,列宁主义学說的根本的一点是,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每一个人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保证民族解放运动进展的一个条件是它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以

及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牢固的团结和合作，而共产党人是首先預見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的，而且想尽种种办法来鼓动民族解放运动并給它指明方向。

怎样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問題上的方針、指責和派系活动呢？是他們脱离现实么？是他們对和平与革命的問題采取教条主义和学究式的态度么？是由于他們不了解我們时代的具体情况么？可能这些都是使中国同志采取这种立場的因素。但是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特点、由于旧的民族矛盾的殘余、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当前任务的不同。所有这些都可能促成分歧和論战的加剧。但是即使承认这些都是事实，毫無疑問，不管怎么样，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共同点都大大超过使它們有分歧之点。共同信奉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階級社会基础和要与之斗争的共同敌人，有要爭取达到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由于这一切，所有各国共产党和所有各国人民不可避免地必須团结起来和进行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現在存在着尖銳的分歧，尽管莫斯科会谈毫无結果，我們應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消除內部分歧、能够恢复并且进一步巩固其团结及各国党之間的合作抱有信心。

我們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革命活动以及它的领导人怀着很大的尊敬并給予很高的評价。我們乐意同他們繼續討論所有引起爭执的問題。当然，我們將从我們认为正确的立場出发，从我們的經驗和我們所制訂的政策出发来进行討論。我們將力求避免爭吵和成見来进行討論，我們將本着力求了解別人并使別人了解我們的态度来进行討論。我們將使全党参加这场辯論，因为我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不仅弄明白和深入理解有关

我們國內政策方面的問題，而且弄明白和深入理解有关国际运动方面的問題。

我們沒有把党的独立自主原則同民族狹隘性、同对有关世界各国革命斗争重大課題的漠不关心混同起来。我們认为，只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出多方面的努力，才能积极地 and 一致地解决使我們之間仍然存在分歧的所有問題。我們认为，我們在这方面也表明我們是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本着深刻的国际主义精神的。

(譯自 1963 年 7 月 21 日意大利《团结报》)

让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二十大 提出的革新原則的基础上前进

意共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26 日

会议通过的第二项决议

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贾恩卡洛·巴叶塔同志就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作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认为，无论当中共以越来越激烈和越来越专横的方式所采取的立场是明显的歪曲时，还是当这些立场的性质是公开地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本着普遍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斗争战略路线时，都必须明确地拒绝这些立场。中央委员会重申，作为苏共二十大基础的那些革新原则，是不能加以怀疑的，这些革新原则是对局势中出现的新事物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种种可能性——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建立和平共处制度的可能性和有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的重要认识以及对消除斯大林时期给予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的重要认识。这些原则实质上已被 1957 年和 1960 年的莫斯科会议所确认；它们在和平政策、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进展以及在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的斗争和获得的成就中经过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完全符合我们党长期以来在意大利和在国际方面进行的制定政策工作和政治行动。表面上接受原则，骨子里却拒绝或否认，旨在实现这一路线和前景的政治行动，是荒谬的，并应受到谴

責。相反地对各国共产党來說，充分理解、始終如一和大胆地发展这些立場，頑强地致力于貫徹这些立場，都是必需的。中共在試圖使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方針占上风方面，使用了应当受到譴責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以派別活动为基础的，并且号召进行派別活动。这样便不仅損害了中国同志宣称願意維護的团結，而且实际上也阻碍了那种研究、钻研和討論的进程，而由于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这个运动在全世界面临的新的、錯綜复杂的任务，今天这一进程是必要的。

我們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时以及以后，曾有机会同中国同志公开討論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現有分歧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基础的那些根本問題。中央委员会現在号召全党，坚定不移地同时本着坦率的精神，从我們的立場以及我們政策的制訂和經驗出发，来进行一次深入而負責的討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事业的尊重和敬仰，为了了解可能是中国同志錯誤的根源的政治历史原因而作的努力，对問題的严重性和解决問題的困难的認識，絲毫不能也不應該证明下述論点是正确的：这种論点可能使各国共产党要么陷于停滯状态，要么进行极端主义的冒险，要么采取抗拒态度，抗拒当前分歧和問題本身表明了的那个工人和共产主义战綫各部分必須更迅速地予以推进的发展过程。

因此，我們进行的討論、研究、斗争，應該致力于更源入地体会和积极发展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致力于使工人和民主力量为了在整个西欧前进而采取一致行动，并且應該致力于反对一切涣散斗志或安于現狀的危險，同时有力地肯定在建立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团結方面前进的要求和可能性。因此，重要的是承认客观现实中共同的东西和分歧的东西，同时以这些为依据来实现团結，在这种团結中，可以更好地确认各党的自主，确认思想上和政治上貢獻多样化的必要性，确认不同立場之

間的交鋒和真正的開誠布公的爭論的可能性。意大利共產黨將不放棄任何機會，將不放棄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維護和促進團結以及國際群眾組織的自主作用的任何可能的倡議，以便維護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的勝利鬥爭中的團結和一致。

（譯自 1963 年 7 月 28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賈恩卡洛·巴叶塔在意共中央 1963年7月全会上的报告

巴叶塔首先指出，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严重分歧，是越来越加剧了，党从公开发表的有关我们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工作的各项文件中了解了这些分歧。当时进行的那些辩论，后来仍然继续进行，并且聳人听闻地公开化（这也是违反莫斯科协议的文字和精神的），甚至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由此而来的政治斗争中，先是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而后则是中国党领导人公开采取了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容许的表现，这些表现是：从事国际性分裂活动，不正当地干涉其他共产党内部生活，攻击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党和领导人。

巴叶塔指出了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苏中两党代表会谈并未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结束，并且似乎没有促成任何接近，也没有就继续讨论的方式和至少创造使讨论得到积极结果的前提的可能性达成原则性协议。接着他说，所有这些使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感到十分难过，使他们既感到严重忧虑，又感到非常关切。在这时期，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表示愿意明确地看待事物和做出反应，以便保卫代表劳动人民和人民普遍利益的政策，谴责任何分裂企图，在像当前这样的困难时刻，为维护国际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而奋斗。

巴叶塔接着追述道，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积极地参加了莫斯

科文件的起草工作之后，签署了这些文件，并給予这些文件以积极的評價，因为文件证明了为取得一致、保持团结、奠定在理論发展和共同斗争方面获得进一步进展方面的可靠基础而做出的努力。作为这些文件的基础的是对于争取在当前历史时期改造社会、探索符合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总路綫的革命运动的积极評價，各国共产党在每个国家所进行的探討、所提出的目标和所展开的行动，都包括在这条总路綫之内。

在指出中国同志宣称以这些文件为依据来肯定我們认为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立場并企图把这种立場强加給每个党之后，巴叶塔說，在反对这种企图和立場时，意大利共产党人决不打算以武断、放弃原則和投降来予以回答。我們的全部政策以及我們一貫在两条战綫上所进行的反对最高綱領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明证。因此，我們反对要把意共路綫同目的只在于取得局部成果的改良主义路綫混为一談的任何企图。每逢我們提出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民主道路的可能性問題，我們总是強調，广大群众的斗争、群众的組織和存在以及社会力量的变动是决定性因素。

这种立場就是我們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基础，而且特别是通过我們領導群众进行的、使我們得以扩大和巩固我們同群众的联系的斗争，被证明是有效的。这种立場还通过4月28日大选得到又一次有力的证实，在这次大选中，我們获得伟大的胜利，中国同志在他們的报纸上仅仅以寥寥数行报道有关消息，这不是偶然的。

因此，在我們由于我們的作用面作为一个主角参加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辯論时，我們的出发点是：一、我們的經驗，我国的問題，意大利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二、根源于十月革命——我們认为，十月革命的經驗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

一个重要和基本的因素——伟大运动的国际經驗；三、我們的革命学說即馬克思和列宁学說的原則。

接着巴叶塔在列举了目前辯論的基本問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爭取裁軍与和平的斗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道路的多样化，共产党和工人党間的生活和关系以及爭取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的真正团結的行动——之后，一一闡述了这些問題。

他首先再次表示深信：爭取和平的斗爭今天是爭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動的中心問題，有关这个改造的問題正在以新的方式提出，避免战争的新的解决方法是可能的，而且应当爭取。我們还认为，爭取和平的斗爭是各国人民解放斗爭和建立新世界的前提。事实上，和平共处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发生危机，为进步力量的前进开辟了新的可能。因此，我們认为把爭取和平的群众斗爭，把揭露核灾难的危險，把旨在取得局部協議并提出普遍裁軍問題的行動无中生有地說成和平主义的投降的任何論調，都是十分錯誤的，我們反对这种論調。不把这个斗爭的意义也理解为就裁軍达成局部協議和建立“无原子”区，那就是不去抓住国际形势的关键所在。至于我国，我們十分清楚在欧洲和地中海建立无原子地带这一要求的意义，我們也十分清楚，这一要求是怎样同我們在其他各方面的斗爭联系起来的。

今天，必須首先承认在原子和热核阶段提出和平問題的新条件。在这方而，把人同技术对立起来，只不过是句空話，其目的是要掩盖热核战争的危險和这个战争給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們一方面要指出，陶里亚蒂同志是第一批指出这种新条件并用新的方式提出緩和局势問題的人，我們另方面也要重申，我們非常贊賞并且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以及它所表明的伟大責任感。如果有人說什么投降，我們就应当提醒：如果說今天存在着一种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使帝国主义不能把原子武器加

以垄断从而得以进行一切压迫和讹诈的话，那是依靠苏联，依靠它的技术科学成就，依靠苏联各族人民的劳动和牺牲。

错误的判断

巴叶塔接着指出，中国同志一方面说什么“和平主义幻想”，向帝国主义投降，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公开提出另一种理论，来同和平共处政策对抗，他们有时拒绝人们对他们作的关于不承认战争危险和不足以足够的力量来反对战争危险的指责。但是，事实是，他们不止一次地阻挠争取和平的行动和争取裁军的群众运动。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局势作出错误判断的结果。看来，中国同志不愿意了解(战争)危险的严重性和现实性，不愿意了解即使只是放松争取和平的警惕性行动也会多么危险。事实上，在中国的文件中，人们确是不把争取和平的行动看成真正调动群众争取和平的对象，从而否认这个行动是可以实现的，把所谓“和平主义幻想”看作是真正危险，而不是把对好战分子的意图漠不关心或听之任之看作是真正危险，同时，还把为争取达成和平协议而作出的努力看成对帝国主义的让步。这是一种在基本的和极为严重的问题上玩弄“革命词句”的政策，这种政策使人冒灾难性的危险，并且否认冒险主义和缺乏现实精神所能带来的后果。

巴叶塔接着追述了苏联政策的胜利，从积极地和决定性地干预去年秋天的古巴危机(由于这样，美洲半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在今天得以保卫住，尽管一切威胁尚未消失)，到争取裁军的坚持不懈的活动(昨天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正是裁军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一个胜利，我们热烈欢迎这个胜利)。因此，苏联和平政策的果实正在成熟，尽管成熟得很慢，因此，在这个时候，任何反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态度，看来都是奇怪的，甚至是恶

劣的和应当加以譴責的。但遺憾的是，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國對共處原則進行攻擊，並且反對力主共處的和人。

但是，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哪些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反對和平共處原則、認為緩和局勢是使自己更難於保持自己的統治和特權地位的力量。這些力量就是極端主義保守集團，是敵視工人運動和各國人民解放的階層。而我們意大利共產黨人證明自己在進行同爭取緩和局勢直接相關的鬥爭和總的政治進展。同時，他們也同樣證明自己在推進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

事實上，實現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乃是構成帝國主義制度危機和構成革命運動據以發展的新條件的各種因素之一。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今天在許多國家可以是不同於過去所走的道路。八十個黨聲明中就曾明確地肯定這一點，它承認，“在和平共處的條件下，出現着有助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展階級鬥爭、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的可能性”。

因此，這就涉及國際工人運動中目前辯論的第二個基本問題。我們相信，和平和民主地實現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可能性，應當加以認真考慮。人們確實不可把革命亦即取得政權和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造，同起義、內戰或游擊戰爭等混淆起來。起義、內戰或游擊戰爭曾經是也可能是某些革命過程的特殊和主要階段。在追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有關論點後，巴葉塔指出，但是中國同志卻在他們的論戰中，歪曲和篡改他們也簽了字的共同文件以及其他黨在制訂政策上取得的成果。

對於中國的論點，即歷史上還沒有從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向社會主義形式和平過渡的先例，我們不僅要在理論上堅持，新條件使得沒有先例的解決方法成為可能，而且我們還要舉出最近一個有關例子，即古巴，在那里，固然是通過同農民革命相聯繫並且轉變成為農民革命的游擊戰爭才推翻了前資本主義專政，

但对于必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信念，是随后才逐步产生出来的。

而且，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事实上，一方面有阿尔及利亚的严酷激烈的战争，另一方面也有加納的和平革命。

还有一个問題是中国同志同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持相反意見的，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运动发展的道路問題，分歧既涉及怎样理解这些地区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又涉及这种可能性似乎应当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同志断言，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应当是表现在这些地区的矛盾，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沉重打击着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中国同志还說，“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

我們重申我們在这方面也忠于列宁主义政策原則和国际团结，同时也相信，正因为这样，必須不被那种对这些运动和这些国家人民所进行的蠱惑所引誘，而首先应当記住，解放斗争、民族革命，乃至已經解放的国家今天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过去和現在都以世界上业已产生的新的力量对比作为基本条件之一，而在这新的力量对比中，首先有苏联，社会主义陣营（在这个陣营当中，也有人民中国及其全部影响和革命經驗）和工人运动的普遍发展。

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有效的例子。如果没有新的世界局势，沒有苏联的存在和力量，又怎么可能設想印度尼西亚会抵制住帝国主义者，并且采取民主做法，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呢？又怎能設想印度的經驗呢？印度虽然經歷种种痛苦和矛盾的事态变迁，但仍作为和平力量出現于当代政治舞台上，即使这一点为中国同志所否认，即使由于一場边境冲突，这一点似乎已被当成疑

間，乃至不再符合事實了。然而，正是中國同志自稱為五項原則的倡導者和創議人，這五項原則似乎承認亞洲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局面。

我們認為，不承認當前歷史時期的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不承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的力量對比、解放革命和通過民主的非資本主義形式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新道路是以這一基本矛盾為轉移的——儘管不是機械的聯繫——將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況且，我們看到，這幾年來解放運動正是在和平共處條件下發展的，甚至在那些鬥爭最尖銳的地方也是如此，在這些地方，解放運動同帝國主義列強發生了衝突，而在新的世界局勢下，帝國主義列強沒有能夠使它們的全部戰爭壓力發生作用。因此，我們斷定，國際緊張局勢的加劇肯定不會有助於這些地區仍然面臨的種種問題的解決。

但是，由於我們所處的情況，我們首先並且特別應當指出其錯誤和予以拒絕的是：低估和不了解作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大本營的一些國家的工人先鋒隊、民主和勞動人民運動的作用和影響。我們認為中國同志對我們黨的攻擊是沒有理由的和無法接受的，因為這種攻擊表明對我們所處的条件、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缺乏了解。

我們一向拒絕一切把工人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全部發展和前進僅僅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和前進為轉移的立場。但是，我們認為，了解總鬥爭的不同要素之間的聯繫是主要的，同國際上的聯繫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非常關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影響和作用問題，力求為不斷發展這個運動的戰略和策略貢獻我們的力量。西歐十七國共產黨就是本着這個精神在1959年舉行羅馬會議的，我們要沿着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事

实际上，在世界上这个地区，有一些问题是属于大家的问题，另有一些问题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如关于争取裁军、反对原子危险的斗争、反垄断资本的斗争、同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劳动者团结的某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今天通过他们的行动乃至通过他们硬说自己的行动也可以在西欧施行的企图，表明教条主义的危险是多么严重，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宗派主义的碌碌无为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害。

不同的經驗

这对我们来说，应当起警告的作用，它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大胆地提出新问题和革新要求。西方国家工人运动应当感到所负的历史责任的重大，这个责任要求根据符合新情况和新任务的政治路线，进行研究、辩论和共同斗争。

巴叶塔继续说，对于我们最近的、最现实的问题，中国的论战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他们建议我们采取的那些虚妄的立场，会使我们处在脱离群众的境地，会使我们脱离中国同志所不了解的并且拒绝了解的那个现实。

巴叶塔接着强调指出，论战和对立不应当被看作是偶然的，或是由纯属临时性的原因或随便那一个原因造成的。论战不应当使我们不去思考、不去深入探讨和展开讨论，而讨论是能使自己了解并且使别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的，它能使人探索出业已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原因。错误也是历史的产物，要克服错误，就要了解错误。

可以肯定，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采取我们认为极其错误的立场，其原因也应从这个党的革命经验的特点中去寻找，应从这种革命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行动所特别据以进行的阵地的特点去寻找。社会主义革命是继几十年的内战后在中国壮大

起来的，这个国家在欢呼胜利的同时，却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幅员广阔，人口众多，面对着因帝国主义、侵略破坏和战争而变本加厉的百年来的落后状况。由此可以设想：“跃进”理论的制订，对于同帝国主义猛烈冲突问题所持的态度，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和阶段以及共产主义前景的不理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某种历史的捷径来摆脱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困难、艰巨性和长期性。

最近的一些提法，至少就相似性一点而言，使人想起托洛茨基的立场，使人想起关于不断革命、不能同资本主义取得暂时妥协等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左”派集团所持有的提法。就在当时，前途的种种困难也曾似乎把那些本应参加恢复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人们中间的某些人吓倒，使他们临阵脱逃。但是，中国立场所表现的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统治和它近几年来企图孤立中国，似乎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厉害了），是过高估计主观因素。我们认为，可以说：令人想起不久前长期而极其艰苦的军事经验的那种党的组织和生活的形式和方法依然被采用，被称为“个人迷信”的那种因素依然存在。

我们认为，中国同志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并且反对苏共和其他党所进行的反对个人迷信，这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依我们看来，当前的困难和问题，不如说是要求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必要的断然行动中得出全部结论，从而使工人和共产主义阵线的每个部分都更迅速地和大胆地向前迈进。

我们固然要竭尽一切努力来探索我们所谴责的错误的原由，但这绝不是说要替错误辩护。有人说，目前是什么“中国的三十年代”，但是，必须谨防做出错误的比拟和肤浅的历史对比。事实上，今天的情况大大不同于苏联当时所处的情况，世界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我们今天不仅要就日积月累的成就和

牺牲来了解苏联經驗，我們也要了解对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那个东西所进行的批判和譴責，这个东西是不能以任何类似的历史情况来加以辯解的。我們是首先承认社会主义建設的新的、不同的形式应当同中国經驗的特点相結合的，尽管近几年来，我們不只一次对中国所执行的政策之矛盾发展感到意外和困惑不解，尽管我們看不出被說成是决定性的一些轉折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但是，辯論的主題首先就是共处問題，是社会主义陣营内部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关系問題。因此，这是有关所有人而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乃至生存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一看目前辯論的展开状况，同时讓我們再次回忆一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么，我們就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对局势和前景所做的判断，已經被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在基本趋向上是正确的。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危机加剧和普遍化的年代，在那些年代中，表现出不能在殖民主义、冷战、美国的绝对統治等公式内制止上述危机。

发生了阿尔及利亚爭取解放的事件，非洲开始走上肃清殖民帝国的道路，尽管其过程是矛盾重重的。在亚洲，解放了的国家在抵制和发展，解放力量在壮大，旧的帝国主义堡垒則在崩潰，尽管旧的保守势力和新的反动集团仍在抗拒或企图壮大声势。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古巴在包围中，在侵略和訛詐下存在下来，它是整个拉丁美洲的灯塔。新資本主义的政策尽管作了新的让步，但也沒有能够使拉丁美洲平靜下来。

今天，摆在我們面前的现实，同昨天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它有新的困难。但这是一个奋勇前进的运动的困难，这个运动每一步都要受到敌人的抗拒，不能把这个敌人縮小为可以貼到儿童画册上的一只老虎。既然在前景、政治行动和宣传上犯下了

使人們产生幻想、不理解和沮喪的錯誤，这就必然要使我們消除任何公式化和簡單化，而絕不能使我們看不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其前景的那个过程的发展的总路綫。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說，这个过程在爭取緩和局势和和平共处的时代将会获得更迅速和更蓬勃的发展。

这样，巴叶塔就談到目前工人运动的辯論的第三个基本問題。他指出，我們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它已經取得无法遏制的进展，而且应当日益向前迈进，这是由于目前經驗多种多样和通过民族道路向前迈进的結果。我們日益清楚地看到深刻革新的具体而不可抹煞的必要性，这个深刻革新涉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全部政策。这个过程不可扭轉性，向后倒退的不可能性，由于新形势的种种困难，不是被取消了或縮小了，而是相反地更突出了，新形势要求采取新的方法和形式，要求对不再是昨天的問題进行新的理論闡述。

如果在这个时期，曾經发生矛盾，甚至有时发生激烈斗争，有时产生幻想，甚或犯錯誤，那都是不足为奇的。我們处在国际革命过程的一个艰巨时期，这个革命过程不是詩情画意的。为此，我們拒絕接受任何对已經完全过时的过去的种种作法恋恋不舍的主张，为了完全克服这一点，首要条件就在于展开如目前这样的全面辯論和政治斗争，我們不能因为考虑到目前的争执会给社会主义陣营和各国共产党带来严重困难而望而却步。

因此，問題关系到各党的关系和近几年来所努力爭取的新团结。我們认为，应当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經选定的道路走下去，而不是向后退来解决上述問題。

当我们断言今天沒有领导党和领导国的时候，我們是指什么呢？这并不是說，否认苏联的决定性重要意义，否认苏联的影响和作用，所有这些在近几年来都显示出不仅对工人运动而且

对人类命运本身都具有决定意义。难道是指任何党、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共产党及工人党发号施令，任何党都无权从外部来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生活和問題嗎？但是，我們党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我們的經驗中沒有采用过这种做法，也沒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恰恰相反，我們所要指的是：如果把不存在领导党和领导国（指苏联同志）这一提法說开来，那就是說，苏联經驗的价值虽然是重要的，并且往往具有根本意义，但它却絕不能也絕不应成为公式。

今天正在展开的全面辯論表明，在新形势下，需要有多种道路，在新形势下，持有多种見解是切合实际的，想要排除辯证关系（它当然也包含犯錯誤的可能性，会引起政治对立，但在經驗和实践效果中会受到考驗）則是学院式的和不切实际的。因此，今天問題不仅在于提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已經体現在实践中了，其根据則来自历史、客观条件和各国工人先鋒队的能力的差异，因为教条主义者把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同奉为神明的形式上的統一这种退化混为一談。

各党虽然以列宁主义原則为基础，不能撇开国际經驗和一致确认的共同原則，但它們的生活却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它們成立的方式不同，由于它們所处的环境，由于领导集团在使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不断适应新需要方面的能力有大有小，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組織也不能只限于承认对大家都适用的而且永远有效的法典，它是同革命方式、革命根源乃至同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前的国家传统和社会关系都是有关系的。

团 結 問 題

因此，我們认为，不要把任何差异鬧得滿城风雨，也不要

辯論中片刻出現的對立，鬧得滿城風雨。事實上，這種多樣性是存在的。因此，社會黨領導人的立場是荒唐的，他們在這些問題面前選擇了旁觀者或教育家的角色，時而要求我們斷絕我們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聯繫，時而又要我們對任何行為和任何言語負起共同責任。

因此，必須取消公式化，而應當就事物的實際狀況來識別事物，應當奮力前進和改進工作。

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及其各黨之間的关系方面，問題也以新的方式提出來。合作和國際分工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一個前景，它意味着在承認國家主權仍然具有根本價值的基礎上，展開討論和逐步發展，即使可能引起對立。如果站在錯誤理解的自足自給立場上，或是站在特權或虛妄的威信立場上，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看來必須從可能和必要這一點出發。

甚至最近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發號施令或公式化的做法是不符合當前需要的，這種做法在不久以前曾不止一次地造成損害，其影響往往甚至反映在當前关系上。

巴叶塔繼續說，近年來，不止一次地提出各國共產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关系問題。我們在最近一個時期，同它保持了同志式的关系，這種关系並不排除批評、論戰和分歧，我們過去已經進行了批評、論戰和指出這種分歧，我們現在不認為應當回過來修改我們所作過的批評和論戰及所指出的分歧。但是，我們同其他所有共產黨，首先是同蘇共的关系也表明，即使在這方面，也有可能和有必要對靈活的團結採取新看法和新做法。中國對南斯拉夫同志採取的立場，在我們看來完全是作為借口，明顯地一反幾年以前中國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對南斯拉夫及其領導人採取的立場和看法，這正證明中國的攻擊具

有要手腕的性质。

我們为国际工人团結的破裂危險、甚至仅仅是它的削弱而感到严重忧虑。当我们談到有必要建立灵活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时，我們并不是指可以达成最小限度的团結。恰恰相反，我們所要的是最大限度的团結。但是，为此必須努力了解客观现实。因此，我們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信件中的如下一点非常重要，即在提到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业已达到的广泛規模和各党所处的不同条件之后，它說：“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問題可能出現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情况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行动呢？应当由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就宣布这个国家已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嗎？这将是名副其实的专橫的表现，这种方法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苏联的这一立場表现出那些已經或者可以看到人剝削人业已消灭、剝削階級业已消失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客观性，就是說，不受种种矛盾乃至严重分歧的影响。这种客观因素乃是促进統一的因素，在提出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問題时也必須从这一因素出发。

因此，新的安排的前提是要有新形式的关系，在我們看来，还要有負責而开誠布公的辯論，要始終考虑个别需要，考虑民族条件以及民族条件同运动的总需要的协调。在差异中求統一的問題，不是表现为机会主义的让步，而是表现为公开放弃任何形式主义，表现为克服对过去时期的团結形式的怀念，这种团結形式今天乃是一种空壳。

这当然不是說，我們不应对像中国同志所提出的那种我們认为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政策加以判断和譴責，也不是說，我們应当不去揭发和譴責他們所进行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

动。恰恰相反,这是进一步澄清問題的前提,是以国际主义为依据的民主和工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的基石。

在这个方面,也提出了一些现实和实际的問題,例如不論在任何类型的国际組織中,中国同志都玩弄手段,进行目前已經公开的斗争,反对包括我們党在內的其他党的政策,反对同其他傾向的劳动者和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相互了解和实现团結的任何可能性。

巴叶塔說,在这些組織中,曾經而且願意进行充分而热情的合作,其目的也是要扩大这些組織的群众性,发揚其內部民主和独立性,使之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場所(这些組織內的斗争不是政治斗争),或者被当成一些党、一些或一批国家的工具或附属品。

巴叶塔在即将結束时指出,中国同志在欧洲国家中进行着分裂活动,尽管迄今成就不大,这种活动引起了托派残余集团和自称左翼反对派的注意。

我們展开我們党內的辯論,当然并不是由于考虑到什么意大利的“中国人”或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就像那些过去已經多次在有关我們的問題上犯了极其明显的錯誤的人以为可以那样說的。我們之所以要在党内广泛展开辯論,是因为意識到我們在国际运动中所肩負的責任,是因为我們的同志对国际主义的热心关怀和他們所具有的深刻的国际主义感,同时,当然也是因为近几个月来的事态发展和政治斗争不能不在意大利劳动者和共产党人中間有所反映。

就我們內部的問題來說,我們打算仔細地进行政治澄清工作,因为我們知道有一些幼稚激进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也有一些教条主义的立場,这些也是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同时,我們也将努力給予任何形式的斗志涣散和任何大惊小怪的悲观主

义以反击，这些现象是国际论战可能在一些劳动者团体或者在某些虽然不同意中国立场并宣称同意党的路线的同志中间引起的。

政治斗争和辩论吓不倒我们；我们正是这样才壮大起来，发展起来的。党教导我们，葛兰西教导我们，陶里亚蒂同志通过他的日常行动教导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来对付政治斗争和辩论。

敌人近几天来又一次暴露了他们对于有关我们生活和思想力量的问题的认识是多么贫乏。他们表明，在4月28日大选以后，他们企图看到我们发生危机的幻想是变得更为绝望了。在这些研究家和预言家的名气和所做所为的后面（他们已经多次为事实所驳倒），暴露出他们在了解事物方面完全无能为力，暴露出他们的肤浅。由于他们的粗心大意，他们过去帮忙了我们，将来还要帮忙我们。

我们在辩论中并不仅仅要重申我们对业已表明其正确性的政策的信心，我们还要通过辩论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澄清，从而取得新的动力来推动我们的日常活动和斗争。

在国际方面，我们将继续参加辩论，那些指望或唯恐意大利共产党人袖手旁观的人可以相信：我们将会呆在我们的位置上，这个位置绝不是旁观者的位置，也不是等待主义者的位置。我们应当明白地向中国同志说的话，我们过去都说了，而且将来还要说。我们决不会去做的是：听任自己去从事一场不讲道理、对一些革命力量既不密切注意又不尊重的论战。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拒绝非分的妄想、肤浅、谩骂。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也还应当分辨出论战和斗争的中心问题、主要问题。但我们同时也应当记住我们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这些年中所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考虑主要问题，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的其他方面置诸

脑后,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問題置諸脑后,这些問題一旦被束之高閣,就会影响到根本問題。我們已經懂得:必須有理,行动方式是行动本身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依靠我們經驗的力量,依靠對我們学說的領悟,依靠革命干劲,我們要好好地進行政治斗争,以便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本着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好好地打一番胜仗。

(譯自 1963 年 7 月 27 日意大利《因結報》)

我們將前進，我們將不後退

帕爾米羅·陶里亞蒂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指出，人們不能肯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年代中，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會盡量利用客觀局勢所提供的擴大和發展的可能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遵循的路綫總的說來是正確的。爭取為社會主義變革開辟道路的進步的民主制而鬥爭，工人力量、民主力量和人民力量的團結，同工人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的團結，毫無保留地支持受殖民主義枷鎖壓迫的各國人民的解放；這些就是一種旨在打垮反動保守階級的主要行動道路，這些階級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執行者，而帝國主義是我們運動在全世界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的倡議，迫使形勢惡化，進行封鎖和發生衝突，因而產生事態發展的特殊趨向。但是敵人的抵抗和反應，應該始終是我們估計到的。另一方面，我們要強調指出，由於我們的缺點和我們的錯誤，這就導致某些局限性和失敗。我們認為，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體上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對於新的因素、戰略和策略的方針認識不足，而這些都是隨局勢而轉移的，它們已經在戰爭期間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的行動中孕育着了，不過它們接着要求人們徹底地了解 and 始終一貫地加以發展。另一方面，相對地未能迅速掌握客觀局勢正在發生的變化和轉變，也未能使判斷和行動適應於連續不斷地深刻地運動着的現實情況。由此就產生了困惑、故步自封、錯誤和停滯。我們認為，這些缺點在我們黨的方針和行動中表現得比其他地方為少，但是，我們也要正確

地作自我批評。最严重的事情是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理論的发展因而受到了压抑和阻碍：学究式的重复方法比研究和革新的方法占上风。人們也不能說，所有这些缺点和錯誤仅仅在資本主义西方国家中表現出来。在仍然是而且應該是我們整个运动的灯塔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們也仍然落后于必要和可能的发展，人們积累了若干沒有解决的問題，也积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这些問題和錯誤應該继而加以公开揭露，而且凡是在沒有及时糾正它們的地方，它們便有助于引起激烈的、有最严重危险的破裂。

必須有力地加以糾正，而在苏共二十大的时候进行了糾正。二十大給了我們什么？首先，它說了真象。它揭露了錯誤和对社会主义进行的达到了犯罪程度的歪曲，认为这些錯誤和歪曲在各方而对我們的运动沒有产生严重后果，那是荒謬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使人看不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充分发展的革新的民主制和作为自由的最高阶段的基本前景，以致于在目前仍然限制了把工人阶级、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爭取到团结和革命政策方面的进展。但是除此之外，二十大是第一次正确地認識到在目前的局势下已經成熟的新的因素。二十大从这种認識得出了結論，它对于我們的运动起了决定性推动作用，使运动繼續在我們理論的基础上粉碎陈腐无力的教条主义的鎖鏈，从而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我們采取从二十大产生的新的立場。这些立場可以归結为恢复客观地研究现实情况的良好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正确的政策、战略和策略的指南。我們記得，关于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上的发展是目前局势的主要因素的論点，关于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論点，关于社会主义前进道路、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殖民帝国崩潰的不可避免性等論点。这次代表大会不

可能为所有的共产党规定全部的政策。硬要这样做也是荒谬的和错误的。但是，由于代表大会拟定的立场和代表大会在制订中使用的方法，使得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研究和新的钻研的必要，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责任。不仅在代表大会期间，而且在代表大会之后，要求每个党完全意识到它自己作决定和发展的独立自主，这样便确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的经验和发展所确立的东西。

我们不愿把这一点称为转折，而宁愿称为恢复正确道路，这一点是多么必要，它已被后来的全部事实所证明，这些事实中不排除破裂和矛盾，这些破裂和矛盾也有助于证明变化是多么必要。今天我们感到，在二十大以后，我们无论在认识和估计现实事物方面，还是在经济建设、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和钻研我们的理论方面，我们都前进了。

然而，中共领导机构的同志们通过他们最近的二十五点文件，恰恰是向这个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这一决定性关键开了火。中国同志首先拒绝的是二十大的决定和方针。这样他们就拒绝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近发展中新的、好的和正确的东西。

让我们研究一下他们支持的立场吧。人们很容易看出，他们在正式声明同意整个运动的提法和立场之后，总是跟着提出否认或歪曲这些立场的东西，同时根据这种歪曲，竟然或企图拒绝理解和确定现实情况的新方面的一切努力，拒绝使我们的政策适应这些新方面的努力。说人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它也是“纸老虎”），这就妨碍分析和确定战争的新特征。说人们不应该“把各国人民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国合作上”，这就否认利用甚至最微小争取和平事业的可能性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议会迷”这个吓唬人的字眼，便堵塞了在一些议会制是人民的成就的国

家的新条件下，走上保卫和发展民主制的非常重要的形式和方式的道路。說普遍裁軍是“純粹的幻想”，这就排斥了全体广大和平战士。說“和平共处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說法是无可反对的），这就拒絕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么有成效的外交政策方針。抽象地根据原則来拒絕一切正确的新政治立場的作法，終于达到了极点：把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在譴責个人迷信之后得到的发展說成只不过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的确，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方法竟然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一个党的领导人所編写的文件中居主导地位。那些讀过这位同志的著作和文章的人都知道，非公式化地估計现实局势和使政治行动适应这一局势的能力，曾經是他的理論和政策制定中的特点。我們很难解释他目前为什么遵循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如果不深刻地認識我們学說的原則，如果放弃这些原則，从而使我們陷入政治上的純粹經驗主义，那就糟了。但是，如果我們的原則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經常更好地了解今天的世界、了解階級和政权的复杂的內部关系的障碍，是我們在这个现实中行动，引导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障碍，那也糟了。当事物和人起了变化，劳动人民朝向我們不是为了听传道，而是为了被引导到取得越来越新的成就——即使是有限的和部分的但为将来开闊了道路的成就——的时候，如果我們陷入对革命作抽象的——甚至可以說是喧囂的——預言，那也糟了。如果我們不去滿足这一需要，那我們就确实要不仅让位于社会民主党，而且要落后于保守和反动势力。

我党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經驗，并且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有力地援助、支持了我們，并且推动了我們向前迈进。因此，中国同志对这些決議进行如此公开的攻

击就只能在我們队伍中引起惊讶和坚决的谴责。用思想和行动参加制订和执行我們政策的我党数以千计的党员和干部，对这一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犹豫。首先也是因为我們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要求忠实于原则而又大胆地进行制订政策，以便不落落后于现实情况的发展，以便在探索、研究和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最前列。中国同志想迫使我們后退，走向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故事自封——我們曾受其害，并且我們现在还部分地受其影响。必須很明确地回答他們說：我們將向前进，我們將不后退。

（譯自 1963 年 7 月 27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团 結 与 辯 論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共产主义只是在1917年，即二月革命之后和随着十月革命，才开始在国际上和在一些国家范围内作为领导力量而确立起来的。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新社会的经济建设却只是在克服了种种惊人的困难之后，于1927年左右才开始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大强国之一，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各国的党的形式，尽管受到无情镇压，还是扩大到了几乎世界各国。在反对法西斯和纳粹暴行的战争期间，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曾经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可能不会战胜，因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无疑会谋求通过卑贱的妥协退出战争。战后，东欧国家中政权的建立（那里的自由和进步制度始终是异乎寻常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后来的其他（朝鲜、越南、古巴）一些新的进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了三分之一人类的领导力量。这一根本改变了世界结构和面貌的巨大进展，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发生的。我相信在历史上找不到以这样飞快的速度来实现客观形势提出的和自己确定的任务的革命和革命运动的先例。

当人们讨论我们的问题时，总该考虑到我们的发展的这种惊人速度。事实上已经证明，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共产主义的政治领导阶级面临一些最严重和最复杂的问题，它必须不拖延地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事态发展不等人。它一般地根据一

种包括現代世界整个现实的理論，解决了这些問題的大部分，但在工作和不断的斗争中也創立了自己的經驗，因为原先沒有可吸取的經驗。

可是目前，在共产党人領導的世界三分之一的地区中，共产党人必須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前进。很大一部分党掌握了政权，有一些党在作为反对派而斗争，另一些党則受迫害和在地下。現在，我們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在新的自由国家中工作。但是，凡是在我們掌握政权的地方，恰恰是缺乏客观經濟条件的划一，也缺乏政治条件的划一。苏联国家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組織、自己的稳定性，这些情况不可能同从一个比如說具有原始的农业結構的、落后的殖民地产生的国家的情况相同。在每个国家中，經濟建設問題本身也由于各国的起点、欲达到的目标、可能的速度、工人階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力量各不相同，而必然以不同的形式提出来。我們认为，一种社会主义类型的經濟发展，将在建立合理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同时，显然会随着時間而減輕甚至克服这些差別；但是目前，这些差別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仍然存在着。最后，甚至在共产主义运动內，只有烏托邦幻想者才会认为，在各个党內的情况都同所有其他党完全一模一样。每一个党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实际生活，明天可能实现这种划一，但划一肯定不是現在的情况。

然而，我今天之所以提到这些情况，不是为了給那些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表现出思想和立場的分歧而大叫大嚷的人們以太輕易的答复，也不是为了使工人运动队伍中那些正当地关心这些分歧的人得到太廉价的寬慰。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为了从中得出一些結論。第一个結論是：分歧的存在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結論是：分歧的存在本身强使人們进行辯論，以

便确切地估計这些分歧和克服这些分歧——这是可能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結論是：这一辯論應該这样来进行：使之不致破坏我們整个运动的团結，而相反地應該使我們运动的团結更加巩固和有效。

我公开地說——然而同时也提醒注意，这是我个人的意見——我不十分相信举行一次大型国际會議来考虑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摆在我們运动面前的一切問題，以及給予这些問題以适当解决的可能性和效果。这种从上层求得的团結一致的形式，已不适合目前的环境了。會議的結果，要么是一种教科书，每一个提法都将由各方面拼凑得出，直到使它作任何解释都可以；要么純粹是重提一下我們的学說的实质性原則。但是，今天理論也正在发展中，理論應該这样发展，而且我觉得，理論和实践的发展在各党领导和負責下进行是很正确的，这些党比一个巨大的国际會議更有能力通过尝试和試驗来进行部分的政策制訂，而以后还可以加以糾正和使之精确。委托仅仅一个党担任为所有的党规划道路并监督人們怎样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任务这种解决办法尤其是不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規模及其复杂性本身，使得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我們所到达的阶段，是各党自主的阶段，这种自主排除单一的“领导”和明确确定每个党的責任。

因此，当我談到辯論时，我是把这种辯論同各国和国际斗争的經驗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是同运动的各部分之間的不斷接触联系起来的，是同取得新的各种經驗的党和国家之間加强交流这些經驗联系起来的。毋庸置疑，这一辯論應該在我們的学說范围内进行，以便改进对我們学說的認識和刺激学說的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存在着，而且是重要的。因此，当人們錯誤地說，和平共处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投降、接受現狀和放弃階級斗

爭時，这就提出了这样的問題：要很好地說明和平共处的意思是什么，它怎么不会导致放弃階級斗争，而是会导致階級斗争的新的发展。但是，如果不依据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以及不久前才解放的其他国家中取得的新的經驗，就不能有利地处理这个問題。同样，当談到資本主义国家中同殖民地或解放不久的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間的历史和政治联系問題时，只要人們不能說明大壟断資本展开的統治最先进国家的行动同旨在以新旧形式保持它对全世界的統治的行动之間的非常密切的真实联系，人們便不能超出一些非常一般的提法。在經濟、事实 and 真实斗争的基础上朝这个方向进行研究，便能够使我們发现在帝国主义正在竭力維持其統治的世界各地制訂我們的政策的新园地，这种研究使我們发现爭取到新的盟友、因而使得产生一个为达到共同目的而联合的反帝力量的大集团的可能性。

但是，事实上，同中国共产党現有領導人的辯論还没有公开。他們提出来的某些問題，无疑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如果他們本来是抱着这种目的，那末我們是要同他們心平气和地討論的，同时拒絕他們的某些說法，設法更好地了解其他一些說法的意义，并提供关于我們政策的必要的情况等等。相反，我們現在却受到了無論从方法上或实质上都不再容許討論的攻击，因为这种攻击立刻造成了爭吵的气氛。只要提到他們所坚持的立場，即使是最严格地依据文本，都成了對他們党的誣蔑和誹謗。但是，一个党即使有过最伟大的过去，也可能犯錯誤。就連在中国党的历史上，人們难道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犯了錯誤、接着就被撤換掉的領導人嗎？另一方面，當他們談到我們的立場时，中国同志的文章向来远沒有提供准确的情况和进行心平气和的討論。在发表一些毫不得体的意見以后，馬上就提出关于背叛了我們的學說等指責。在进行这种背叛譴責之后，接着进行派別

活动和甚至分裂尝试(这种尝试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而在比利时则已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在同中国同志在其整个历史上所处的条件迥然不同的条件下执行的,他们在作判断时是应该采取某种审慎态度的。不言而喻,人们也可讨论我们的行动。关于中国同志的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转变,我们至少也有许多问题要提出,因为事情远没有搞清楚。如果需要这样作,我们就这样作。但是,我们这样作的时候,始终将考虑到把我们同中国同志团结起来的東西、我们共同的学说、他们政权的阶级基础和我們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果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分歧,那么始终应当考虑,这些分歧是在交織的一致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希望就可能有问题和尙待澄清的一切问题进行辯論。但是,希望这种辯論不仅不会損害反而会加强必要的相互了解和必要的团结。在某段时期中,我們也許將有一种差异中的团结。但团结是必要的。

(譯自 1963 年 8 月 3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关于中国的信件

馬里奧·阿利卡塔

我收到了好些讀者写来的关于同中国同志意識形态爭論的若干信件，这些讀者有些是黨員，有些是与我們相距甚远的人（其中有一封甚至是由“在中国住了二十年的一位老传教士”寄給我本人的）。

提出的論据都是現在我党組織內所討論的那些論据；提出的問題也都是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巴叶塔同志的报告和最后決議作了初步答复的問題。我同意这个答复，因此，我觉得无需再重复它。此外，正是因为已在党組織內广泛展开討論，所以，我不认为有必要在《团结报》上开辟关于中国問題的“讀者論壇”专栏，如果这种討論沒有这么广泛地展开，开辟这个专栏才可能是适宜的。

但是，在我們的讀者提出的論点中，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回答两点，这也是因为这些論点直接涉及到每天摆在我們报纸面前的問題。

第一点是某些讀者对于同中国同志真正进行討論所表示的关心，他們希望不要把一切都归結为简单的論战性对立和这种对立所包含的不可避免的粗暴态度。这种关心是正当的。不过，我应当老老实实在地补充一句：我本人向中国同志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見之一就是：由于他們的態度，他們妨碍了有效的思想比較，妨碍了“无私”的意識形态的討論。

正是由于中国同志所談到的三、四个問題，过去和現在都值

得进一步作理論上的集体的钻研，并由共产主义世界进行集体探討和推敲（我所指的是在必要的和平共处范围内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所以，我认为，中国同志下面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他們过去和現在都阻止这种钻研、探討和推敲，坚持譴責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占优势的方針的这种有害态度，此外，除掺杂着对这个或那个人、运动的这个或那个领导集团进行人身攻击而外，还进行真正的咒罵，說人們“背叛”了人民，說人們对帝国主义采取“卑躬屈节的态度”，等等。

人們有时抱怨說，我們的报纸沒有把中国同志“为了討論”所撰写的文章統統全文发表。但是，这些文章难道是“为了討論”嗎？在这些文章里，他們把旁人說成是蠢貨，仅仅是因为旁人不同意他們的全部观点，甚至更坏的是，仅仅因为他們硬說旁人抱有没有得到证实的、事实上也很难证实的“意图”，譬如說什么苏共领导集团的“意图”是要在苏联“取消”社会主义啦，我們（意共领导集团）的“意图”是要在我国“結束”阶级斗争啦。

討論，特别是同志之間的討論，不可能意味着只管闡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願意听取其他人的观点，把其他人的观点看成是錯誤的，甚至一开头就是“腐朽的”。这意味着放肆进行煽动，我們的报纸不仅應該不縱容这种煽动，而且相反地，还應該不但严肃冷靜地、也还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这种煽动。

我想要回答的第二点，表现为人們对这一事实的关心，党与党之間的意識形态和政治冲突，不要轉移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方面。这种关心也是正当的。对此，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人（正象巴叶塔同志在他向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中說的那样）在苏联同志对中国同志的所謂“二十五点”的答复中，滿意地讀到，即使是深刻的分歧也肯定不能使人怀疑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国

家大家庭的，因为它之属于这个大家庭是出于而且只能是出于一种客观的性质。在或远或近的去在这方而所犯的錯誤，应当糾正，特別是不应再犯。

但是，話虽如此，也應該在这里补充一句，这并不意味着，单单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就始終是正确的。在或远或近的去在这方而所犯的錯誤，也应当糾正，不应再犯。

譬如，中国对待印度的态度，过去有現在也許也还有錯誤的地方。在几个月前，我們說过这一点，現在我們也要重复这点，我們是不理睬說这一来我們就站在“帝国主义”国家一边的荒謬指責的。此外，正如事实已經证明的那样，大大錯誤的是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态度。中国对待核禁試条約的态度，則不只是大大錯誤的，甚至像英国同志所說的簡直是“不可理解”的。

莫斯科条約是人民爭取和平的斗爭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多年来进行的和平外交活动的成果。这个条約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們多年来所要求的，因为只要繼續在大气层进行核試驗，就会給全人类造成不可弥补的不幸。大家都理解，这个条約是禁止和銷毀核武器道路上的第一步。但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禁止和銷毀核武器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平力量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目标之一。

中国同志认为，这个条約仅仅是为了巩固某些国家所享有的“原子垄断”地位，并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原子力量同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原子力量相提并論，人們怎么能同意中国同志的这种观点呢？中国政府在它的声明中說，苏联通过莫斯科条約出卖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苏联联合战争力量来反对

和平力量，人們怎么能同意中国政府的这项声明呢？英国同志說这项声明是不負責任的，那是有道理的。

中国对莫斯科条約的态度給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和我們的运动投下了一个阴影。为什么在我們的队伍中出現了与“冷战”的“极端分子”相同的立場呢？

中国的态度标志着目前意識形态和政治爭論的一个痛苦轉折。我认为，这一点是最普通的共产党員所能理解的，是最普通的劳动者所能理解的，是世界上长期以来由于要求終于在莫斯科实现了的这个目标而受到侮辱、受到警察毆打、被监禁的人們所能理解的。

自然，这不能改变我們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持的总的态度，这不能改变我們为在我們的职責范围内繼續进行斗争、以爭取使人們承认人民中国在联合国大家庭应有地位的义务。这也不能改变我們有义务阻止反动力量利用这种錯誤态度，企图扩大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发动一个反对中国“好战主义”和正在复活的“黃禍”的宣传运动。特别是对于后一論点，我們願意进行斗争，以便把这一点以及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無論它們在何处和怎样出現)的一切表現都丢进垃圾坑。但是，對我們表示关心的讀者們應該了解，如果我們不就停止“氢弹”試驗这一点公开指出中国同志作得太过分，那是不道德的。

(譯自 1963年8月11日意大利《团结报》)

关于禁止原子爆炸的协定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中国共产党人猛烈反对禁止核試驗协定，这种立場使极广大的人民阶层和輿論深感痛心。这种禁試虽然是有限的，却也是好几年来广泛的有战斗性的群众运动的基本要求，它的内容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而且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斗争的。此外，禁試也是一个真实的成就，它给予所有的人一种眼前的具体的好处，因为它阻止了大气层和海洋被原子进一步染污，而原子染污也许（有人还说肯定地）是我们今天害的许多病的根源。那末，为什么中国同志表示反对这一措施呢？而且那样猛烈地反对、以致譴責贊成禁試的从苏联政府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背叛各国人民与和平的利益呢？苏联政府是建議和提請全世界贊成这一措施和政府之一。那末，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被他們长期以来对苏共领导人进行論战和斗争的不可理解和粗魯的粗暴态度拖着走，因而完全丧失了理智呢？問題不在这里，而是在于犯了同从中国同志近几年来印发的一切著作和文件中就可以看出的全部虛妄的立場相关联的一个严重政治錯誤。从这方面来研究一下这个問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正确的总方針的某些实质問題。

乍看起来，最令人吃惊的，就是傲慢地和教条主义地拒絕这一有限的部分成就，公式主义地把这一成就同尚未达到的遙远的最后目标对立起来。因此，让我们首先說明，我們非常了解，目前达成協議的禁止大气层和水中原子爆炸既不等于全面禁止

原子武器，也不等于最后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和力量（以及它們的外交），没有全世界的工人民主运动明智而坚决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领导集团，特别是反对它們的极端派的长期的新的斗争，这些更遥远一些的目标便将仍然如故，而且不可能达到。达到了部分的结果，并不抹杀最后目标，而是恰恰相反，反而使得争取达到最后目标的行动在取得初步成就之后更加必要而且也更加有效了。但是，最后目标的存在和意識到这些目标，絲毫也不会像中国人說的那样，不会使得部分的成就成为荒唐的、騙人的和甚至犯罪的。因此，人們便面临了重演工人运动过去在开始时所犯的宗派主义和自吹自擂的原始作法这种最荒唐的錯誤。我們大家都知道，曾經有过认为争取提高工資的斗争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趋势，因为如果争取到了这种提高，这种提高便可能使劳动者同资本主义調和起来，使劳动者忘記他們的革命任务。工人的简单的常識和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很久以来就扫除了这些錯誤。而中国同志却完全重新陷入了这些錯誤。他們的全部理論工作都局限在这个錯誤的圈子中，他們用大量的革命詞句和以各种形式重犯这种錯誤，拒絕运动和部分的成就（有时是在口头上承认这些）。

具体地說，中国政府用一項召开全面禁止原子武器會議的建議同莫斯科协定对立起来。但是，这样的建議已經提出过不知多少次了。实质上，像这样的會議，就是几年来在日內瓦进行的那种迄今未获任何結果的會議。由于最大的国家之間的关系的发展、1962年10月在加勒比海发生的可悲的政治冲突的經驗、后来的思考和接触，才使得达到了能够得到部分結果的地步，那末为什么要拒絕这一結果呢，为什么要譴責这一結果呢？中国政府在它自己的建議中也不是首尾一貫的。实际上，它建議举行国际會議的目标中，列入了在世界某些地区中建立无原

子区的問題。但是，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会在国际最高級會議上让过份武装的最大的国家的可怕原子軍备繼續存在的有限協議嗎？难道这不也是一种部分成就嗎？因此，中国的从一种最高綱領主义的、幼稚的、归根到底完全錯誤的前提出发，犯了前后不一貫的毛病。中国領導人在提出一項外交性建議方面，不得不承认，只能在这方面逐步前进，他們不得不提出和同意有限的、部分的結果是可能的結果，是朝向最終目标前进的步驟。

但是，現在中国同志提出了另外一个問題，这个問題也許是他們反对莫斯科协定的实质所在，也是反对协定的真正的动机所在。他們說，这个协定責成签字国不得向其他国家提供为制造和試驗原子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方法和技术資料。这一来，除了一个苏联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永远不能拥有这种可怕的战争工具，而它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却大量拥有这种工具。除这一批評外，現在又透露这样一点：苏联領導人早在1959年就拒絕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以及它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資料。这种透露涉及到有关国与国間的关系問題，这种問題是我們不了解的，也部分地是我們无权过問的。可是，在国际关系的現阶段中，我們却有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子軍备作总的判断。我們之所以要作判断，是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关于原子軍备費用的考虑，因而也是关于对任何性质的經濟造成的极严重負担的考虑；另一种是关于有必要用各种正当办法阻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和拥有扩散到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考虑。

大家知道，尽管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和財政力量，原子和核武器的生产甚至对它來說也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負担，連一部分美国公众輿論也因而开始考虑頂好摆脫这种負担。在这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对苏联說来是費了极大努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免于这样的努力，因为它的存在要靠它自己，但是，

这种努力过去和现在都使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明显地作一些牺牲、放弃一些东西和使经济发展发生一些真正的畸形。当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还部分地面临工业、农业和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严重经济问题时，这些国家也作这样的努力是否正确、是否合理呢？一个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大家知道，它的经济条件和群众生活条件远不是繁荣的——，为了制造原子武器也作过度的努力，是否合理、是否正确呢？我们的回答简单而明了：苏联对整个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负有接受原子竞赛的挑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痛苦和消极的东西的责任。但是，它的努力和它的牺牲过去和现在都应该产生使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人民中国毋需担负同样的任务的效果。这一点，正是明显地表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它的巨大经济发展和它的世界性威力，怎样帮助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所有国家前进和加强的方面之一。由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除外）都通过互助条约同苏联联系着，上述这一点就尤其是那样了。苏联的原子军备今天相等于或者也许还超过了美国的军备，它是毫无例外的一切国家的保障。为什么这些国家一定要为了拥有自己的原子武器而削弱自己呢？

当然，只有在人们不把生产和拥有原子弹看作是国家威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一论据才是有效的。但是，这个问题是戴高乐将军的立场。我们不是想把中国同志放在这方面相比来咒骂他们。

但是还有另一种考虑，甚至是更为严重的考虑，因为这种考虑关系到各国和我们争取和平的整个斗争。今天，拥有原子武器的是三个国家，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事情已发展成为其他国家都接受这种形势的地步，从这种形势中

已产生了国家关系的特殊结构。这是一种使这些关系有某种简单化的结构，但是这种简单化实质上并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只要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必要的团结、合作和互助。如果人们破坏这种局势，结局将如何呢？一个国家，然后两个、三个，以致每个国家都想制造和拥有它自己的核武器。戴高乐的法国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波恩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企图尽其一切力量这样做。这是它不愿参加莫斯科协定的真正动机。在意大利，今天已不存在一个要求拥有国家原子武器的好战政党。但是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幻想：对戴高乐的同情和同阿登纳的联系都是强有力的。难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因要求自己拥有核武器而自己承担破坏现有局势，从而发动一次疯狂的也许只能以战争而告终的新的核军备竞赛的严重责任吗？

因此，假如苏联真的在 1959 年拒绝为中国的国家核武器创造条件，我们认为，苏联作得好，它为和平、国际缓和和裁军事业服了务，我们大家正是为这个事业而奋斗，全人类命运也取决于这个事业。中国同志们竟然以不负责任甚至可笑的轻率态度，指责苏联同美国达成协议是为了要……取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有利于波恩德国的核军备，这无助于改变我们的意见，而是相反，证实我们的意见是对的。这里超越了一切论战的限度；人们已经把苏联当作敌人看待！其次，假若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正是苏联 1959 年的拒绝，促使了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而对苏联的政治立场进行论战和斗争，那末，这就使得人们对这个斗争的消极看法更加是消极的了。别的不说，假如说就是这种拒绝使他们不满，并促使他们进行如此尖刻的批评，那末，为什么不在已经举行过的国际会议上公开讲出来？在这些会议上，对争论守秘密是有保证的。我们大家本来可以从

我們的相互关系的更加真誠相待中得到好处的。

还有一点應該研究，而且也值得研究。我們所肯定的立場认为，拒絕部份的成就和进展、按照公式用一个最終目标来反对这些成果和进展的做法是荒謬的，这种立場本身对于資產階級还执政而且人們必須在这种情况下朝新的政权、朝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中的階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特別对于我們來說，这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这是值得单独仔細研究的问题。

（譯自 1963 年 8 月 24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关于中国的另一些信件

馬里奧·阿利卡塔

有些讀者就兩周以前《團結報》發表的我寫的社論《關於中國的信件》寄來了他們的意見，有些是他們的批評，還有一些讀者，據他們自己說，也是由於我的社論而才執筆寫出他們對有關問題的看法。

他們又寫這批信件的主要動機，還是需要確切了解和深入討論，同時要求我們黨不要簡單地採取贊成或反對中國或蘇聯的態度，而要努力自主地採取和表示自己对成為討論主題的基本問題的立場。在我看來，勒佐—艾米利亞的一個同志把這些問題總結得很好，他寫道，擺在我們面前的真正問題是表明有可能在和平共處的範圍內成功地推進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鬥爭。

對於又一次堅持提出關於了解情況和需要向大家提供基本文件以便深入討論的問題的同志們——有些同志的口气帶有很大的爭論性，我要說，我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這個問題也必須平心靜氣地考慮，而不要誇大和無故激怒。我同意，如果中國同志提出的“二十五點”和蘇聯同志的答復作為《團結報》的增刊而不是作為《再生》的增刊發表，那可能對所有同志都方便一些。我同意，有些同志可能感到遺憾，因為他們是在某些資產階級報紙上而不是在黨報上看到這些文件的。

但是，首先這絕不意味着黨領導機關想“掩蓋”這些文件（這些話讓《民族報》或《第雷諾海報》的社長去說吧！），或者想“限

制”討論。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我們的各級組織展开广泛討論，甚至举行省委会、积极分子的有关會議来組織和鼓励这种討論。在我們的某些組織中（正如科摩的一位同志抱怨的那樣），这种討論进行得不够是可能的，这个錯誤应予糾正；但是，并不是党領導机关的所有指示和建議在各地总是同样認真执行的（例如，我們在《团结报》知道，組織散发我們報紙的工作就是这样）。

其次，不能把需要了解确切和詳尽的情况当做神秘的事情，尤其不能当作一种无端的借口来“暫不作出判断”，也就是說，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避免表示态度。在我个人看来，从我們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中国同志的立場实际上已經為我們全党充分了解，在那次大会上，我們和中国同志进行了广泛和公开的辯論。这些立場，不但是在发表了“二十五点”之后，而且是在就莫斯科核协定发生的爭論之后，已經进一步和彻底地明确起来。《团结报》几乎每天都有机会提到这些論点，报道（不論怎么簡短）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采取的立場和声明。因此，每一个同志和全党才有条件以最負責任的态度来对这些立場作出判断。如果将来出現了新的重要文件，不論是中国同志的还是其他党的，显然我們也要发表。但是，在我看来，繼續把这些作为我們討論的中心，似乎是有些无聊的，甚至是不明不白的。

但是，有人要求我們的态度不能而且不应降低到簡單地說“苏联同志是对的，中国同志是錯的”，即使是在具体問題上，特别是有关国际政策——如莫斯科核协定——的行动上，在我看来，这种要求是对的，这一点应当說出来，而且应当非常清楚地說出来。（就象陶里亚蒂同志在《团结报》全文轉載的最近一期《再生》周刊的社論里所做的那樣。我請都灵的那位讀者讀一讀这篇社論，这位讀者似乎认为中国拒絕参加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停止試驗協議”是正确的。）

但是，在这方面，我要說，在我們党内，关于总战略問題——这是同中国同志討論的基本方面之一，而且不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使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人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的辯論，并不是象老話所說的，“从某某年”开始。首先必須說，非常清楚，巴叶塔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恰恰是由于感到在目前辯論中應該有我們自己独立立場的需要而作出的。此外，中国同志提出要討論的問題——在爭取和平共处范围内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道路；譴責建立在所謂“个人迷信”制度基础上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生活的任何組織形式等等——是我們党自从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一直注意研究的問題，而且在這些問題上，党过去有过机会为它自己的立場辯护，而且不仅仅是針對中国同志来进行辯护。因此，在党内开展的討論能够而且必須首先是，更好地澄清和进一步闡明我們所規定的战略：在一个象我們这样的国家以及在我們所处的历史时代，“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我前面提到的陶里亚蒂同志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中，他从批評中国同志对莫斯科核协定所采取的立場，轉到指出對我們具有特別重要意义并且应当仔細研究的一个問題，那就是“局部胜利和进展”的問題，亦即我們战略的中心問題，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了走近社会主义而要达到的中間目标問題。况且，我认为，深刻地討論中国同志所提出的战略問題的极好起点仍然是陶里亚蒂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并得到第十次代表大会全体通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革命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动的那一部分。

最后我要簡路地談談另一个問題，因为這個問題在給我的信中不断出現。毫無疑問，在判断中国同志的立場时，必須要考慮到他們所处的具体情况和他們的具体經驗。但是，中国同志

难道不是同样应当考虑例如资本主义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工作的具体情况嗎？在我看来，提出这个问题的讀者們沒有注意到这样一点，即我們今天同中国同志討論的問題并不是在中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形式問題，而是我們运动的总战略問題。这种問題可以获得正确的解决，如果人們不是片面地看待它，而是相反，如果对全部力量（我們的以及其他人的力量）作精确的估計，对今天革命运动进行工作的十分复杂多样的全部局势作精确的估計，象拒絕瘟疫一样地拒絕公式主义的簡單化和教条主义的一般化，而中国同志对这种簡單化和一般化看来却如此津津乐道。

另一方面，我认为，从理論的角度来看，仅仅从中国同志所处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找中国同志所持立場的理由，也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因为在中国同志对苏联同志的最近論战（是在莫斯科核协定簽訂后发展的）中开始表现出非常令人忧虑的調子，这甚至使人怀疑中国同志对赫魯曉夫同志和目前苏联領導集团的猛烈攻击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可以从苏联沒有把原子彈給予中国这件事中去寻找。

如果情况是那样，那事情就加倍严重了。而这是因为我认为，原子国家的数目不要进一步增加是符合所有国家人民的利益的，这是今天实现彻底禁止和銷毀現有核武器儲备的条件之一。还因为这会意味着，在中国同志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公开提出的“意識形态”問題的背后，还有着其他动机，全世界劳动者获悉和了解这些动机的真正性质，可能是一件悲哀的令人惊异的事情。这并不是說我不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間关系有一些复杂的問題，这些問題并不总是正确地解决的，而且誰也沒有权利公式主义地把这些問題“簡單化”。

（譯自 1963 年 8 月 30 日意大利《团结报》）

反对教条主义, 爭取馬克思主义的政策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我們学說的实质在于确认客观力量的发展和各劳动階級的斗争, 目的在于而且将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把当前的资本主义领导階級赶下台, 使工人階級以及那些不剝削他人劳动、事实上构成人口絕大多数的城乡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社会集团同工人階級一道掌握政权。同时, 我們学說的实质还在于意識到, 如果不通过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前进和停歇的、成功和失败的、革命的突然爆发和发展进程較緩慢的斗争, 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我們的斗争目标不能一下子仅靠一次决定性的正面进攻来达到; 也不应当认为, 在一切国家中和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循并且必須分毫不差地遵循在一个特定国家和一种特定情况下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走的道路。今天, 大家想一想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已經执政的国土和国家吧。那就会看到, 有两种、三种、四种甚至更多的达到这一目标的不同行动方式。取得胜利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一个龐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解体的情况下发生的。鉴于这一情况, 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階級力量分布, 从而也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战略策略。对那些指責西方国家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懂得重复俄国十月革命的人(北京散发的某些文件中就有这种指責!), 人們只能回答說, 要作出那种“重复”, 首先必須有同样的主客观条件。况且,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与俄国十分不同的条件下和采用十分不同方式取得的。使胜利成为可能的社会集团和获得胜利的人們的战略与十月革命

时迥然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之后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方式，以及古巴实现目前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方式，应当說也是如此。我认为对这种多样性沒有进行系統的調查研究，甚至是我们运动的一个严重缺点。滿足于說某件事情是与另一件事情“相同的”，就意味着放弃对情况进行历史和政治的分析，而这样的分析是馬克思主义的灵魂，沒有它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反复重申現成的公式和語句，而沒有能力指引和领导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从一个具体形势走向另一个具体形势，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从一个成果走向另一个成果，走向它的目的地。

因此，对我们說来，使共产党的政策，使它的方針和口号切合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国际局势，即研究具体的局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必須的和主要的事情。馬克思主义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永远朝气蓬勃并且保持新鮮，其道理就在于此。不断地把生活在当前条件下的新的一批工人、劳动者、学者、青年、妇女和男人吸引到我们运动中来的因素，也就是这些，他們不能脱离当前条件，他們的全部行动都应当从这些条件出发，因为这些条件既决定他們的生存条件，也决定他們的意識。不止于此，在这方面，人們应当承认，在資本主义西方国家，我們的調查和行动的进展至今还是不符合需要的。今天，特别是在非常发达的資本主义地区，資本主义剝削形式与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剝削形式大不相同，它們表現在新的方面并且在人們生活的新方面也出現。因此，应当在新的陣地上展开斗争；这种斗争必須具有过去未曾有过的內容和規模。我們想到，例如在一些由于历史环境和人民斗争而民主自由得到加强、代議制得到巩固的国家里提了出来并应予以解决的任务。我們想到垄断資本結構在企图怎样使各国資產階

級之間的关系具有新的形式，从而想到以新的方式来組織和表現无产階級和劳动者的国际階級团結是如何必要。今天，不論在哪方面，要想使我們的思想正确，使我們的行动見效，我們就必須首先推进研究、发明創造和試驗，沒有这些，只是重申原則，还不能使政策产生。而我不願意談論与世界那一广大地区出現的嶄新形势有关的問題，那一地区昨天还全都一样地受着殖民剝削，現在却以加速的步伐朝向自由和进步发展，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速度是以前难以設想的，这种方式就提出了一些我們在過去一度甚至連其先决条件也忽略了的問題。在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与“迷信”斯大林有关的一种教条主义束縛被粉碎之后，我們今天看不出由于局势的发展而出現的新問題，看不出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的絕對优势得到巩固并且以这种优势来引导全世界群众，就必须以新的方式很好地正視和解决这些新問題嗎？

面对这种令人鼓舞但同时又令人不安的情景，我們的判断和行动并不总是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它的，而北京宣传的教条主义的文件則对当前問題給以貧乏的、枯燥的、空洞的答复。文件使用的方法是与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极不相容的，它是这样一种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已經說过和重复过无数次的东西。如果你拒絕这种学究式的重复，那你就是一個“修正主义者”。然而，认为列宁会把他对沙皇政权和克伦斯基政权的判断又用来判断一个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当前情况或者一个前殖民地現在成为新兴自由国家的情况，那就是对列宁的不尊敬。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真理既不在于死板的重复，也不在于一系列东拉西扯的引证。真理寓寄于作分析和作結論的方法中，在那种“調查”中，調查是列宁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提出的至为重要的忠言和指示，而中国教条主义却坚决地与此背道

而馳。調查、研究、钻研，这是从北京来的文章总是缺乏的东西。在重彈那些使人厭煩的陈詞濫調之后，人們从中看到的是，用最粗魯的話进行攻击的一种压抑不住的傾向，这些粗話愈来愈恶劣，直到純粹歪曲现实和进行不能容許的侮辱的地步。

在一篇談我国和我們党的事情的文章中，人們恐惧地举出了意大利現有的“极龐大的”法官数字和監獄的数字。誠然，刑罰制度的許多方面今天在我国还是以反民主和野蛮的方式构成的，必須予以彻底革新。不过在目前，当正在組織和进行爭取这种革新的斗争时，我們倒希望有更多得多的法官，以便使穷人不致在审判和有时宣判无罪之前被迫成年累月地呆在牢中。而更多一些現代化監獄則至少会消除烏恰尔多內^①和其他类似的腐化墮落地方的耻辱。这也是个例子，它說明提出来一个总目标，就不能看不到或者小看一个合理的局部要求。

但这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例子。对我們來說，今天，局部目标之所以必要，是由于民主地和相对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有了可能性。局部目标的这种必要性，在过去还不能設想，而今天却可以这样作了。那时，社会主义还未曾取得今天使它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三分之一地区得到巩固的那些巨大胜利。那时，經濟还没有发展到当前这种国家垄断資本主义阶段。那时，使某些純屬社会主义性质的原則，如經濟规划化原則，不再被人事先就加以拒絕，而是把它們甚至强加于那夥过后又拚命在实践中歪曲和窜改这些原則的人們身上的种种条件还没有形成。那时，垄断集团的沉重統治还未曾創造出工人階級在其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同广泛的中小資产階級和知識分子阶层結成新的联盟的可能性，而今天这种可能性存在。同样的小农和中农，在过去还可

^① 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的一个監獄。——譯者

能被看作是些不能接受我們思想和不願同工人階級接觸的群眾，而今天，這種情況已經變了。難道說在我們的一位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很抱歉，在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的條件下，我不能確切地引證）沒有確認，取得同小資產階級農民和耕種者中具有決定意義階層的合作，就導致以不同方式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問題嗎？最後，讓我們不要忘記，工人和勞動者的有組織運動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在我國已取得的民主成果，資產階級不經過一場戰鬥就不可能毀掉這些成果，而在這場戰鬥中，資產階級很可能被擊敗並且自食其一切後果。讓我們也不要忘記建設社會主義經驗本身，它雖然大大豐富了我們的學說，增強了我們的力量，但它也通過“個人迷信”的嚴重消極現象說明不僅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即使在組織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時，民主問題也必須具有並且保持其決定性意義。

確定我們的政治活動並使之開展的這一切條件，完全被北京教條主義的不加思索的批評和攻擊忽視了。因此，這種批評和攻擊便沒有什麼效力。它們只能給我們提供這種證明：那些授意進行這種批評和攻擊的人，目前已經喪失了他們過去曾有過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判斷和推理的能力。而我們則為了使我們的黨員——工人、農民、學者、青年，日益掌握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判斷和推理能力而努力奮鬥，目的是使他們真正成為意大利社會的革命鼓動力量。

當然，在提出這一總方針之後，並非完全不可能犯機會主義錯誤和偏差，也並非能自動避免。然而這些錯誤和偏差不應當以現成的偽裝革命的詞藻來揭露和擊敗，而應當根據今天的情況，根據今天政治鬥爭和黨的情況，通過以下方式作到這點：一方面重申原則，重申要不斷看到我們的社會主義最終目標，另一方面又重申不論是為了爭取最終目標，還是為了爭取局部的成

果和实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都必须一致行动,它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决不要向敌人狡猾的阴谋投降,敌人企图分裂他们,借此击败他们,使他们倒退,用这种办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使斗争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困难。

因此,南尼同志的论据丝毫站不住脚,他把北京对我们党的批评同我们对他当前政策的批评等同起来。大家都看到这两种批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是出自相反的概念和立场。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甚至说不上是什么“论据”,而只不过是适用于竞选演说并且在今天也已经陈腐了的言词罢了。即使在竞选演说时用这种言词,除了取得一时的效果外,也未曾见它起什么很大作用。

(译自1963年8月31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关于某些捏造

朱利亚諾·巴叶塔

不幸得很，中国同志在許多共产党内进行派系活动的消息和迹象越来越多。

人們可以理解中国同志试图使到处都知道他們的立場，只是他們的消息要是不对一切不同意他們的立場的人用咒罵和污辱的語調，那就好了。在这方面，唯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中国同志已經能够判断是哪些人支持这种传播，并且已經能够从中得出一些可供思考的东西，譬如这一事实：在一系列国家中，党的許許多多新旧敌人正是这种活动的热情支持者。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同志的行动远远超出了散布我們认为是錯誤的而且我們决不怕被我們党内充分地了解的那些論点，从第十次代表大会讲坛到我們的报纸大量刊登中国材料，我們的书店发行中国的各种杂志和刊物。我們的中国同志不采取同一态度，他們的报纸对我們的整个活动沉默不語，甚至对我們4月28日选举中的进展只字不提。但这一事实不能改变我們认为是正确的那种同志間辯論的方式。

我們沒有兴趣在这里談中国同志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活动是怎样組織的，我們感兴趣的倒是，要更好地看看中国同志的政治支持是支持誰和采用何种形式。那是来自北京报纸和电台的支持，是对一些集团和个人反对苏共或他們自己的党的一切态度的贊揚。

中国同志对于这一事实似乎从不在乎：这些人大多数仅仅

把中共的威望看作是一面足以使他們在本国工人运动中恢复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丧失了的政治資格的合适的旗子。对这些“朋友”、对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冒然支持，使人得出这种印象：对中国同志來說，更重要的倒是这些人可能起的騷扰作用，而不是他們在一場真正的辯論中和在一次光明正大的思想和立場交鋒中所能具有的說服力。

中国同志介紹这些人的信件和文件的方式证实了上述印象。我們认为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比利时、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实例。

在上述每个事件中，共产党都对后来变成分裂集团的主要代表的旧日同志进行了广泛、民主和公开的政治斗争。比利时的格里巴和澳大利亚的希尔已处于绝对少数，他們的左傾立場不仅在他們直到新近的代表大会为止还参加的领导机构內被打倒了，而且一个在布鲁塞尔、另一个在墨尔本的基层组织內也被打倒了。巴西的情况尤为典型，那里围绕《工人阶级报》组成的一个小集团，是一夥从1956年以来因种种原因离开巴西的共产党的人。

在中国的文件中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情况的任何痕迹：证明某些派别的绝对少数性质，证实这些派别今天只是依靠中国的支持和专事毀謗的反共报纸的吹嘘才能比較显露出来。

还不止此。这些集团和它們的文件，在新近几期的中国杂志《北京周报》中，不仅得到了最广泛的宣传，而且它們竟被說成是在几国中現存的唯一的共产党。

有一个小集团自称为“巴西共产党”。然而，在世界上（和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普列斯特斯的光荣的党叫做巴西的共产党呢？于是人們把“巴西共产党”的決議作为巴西共产党人对苏共的答复向全世界介紹！

比共几十名前党员（其中很多是一家中国通讯社的雇员），把他们的集团命名为“布鲁塞尔共产党地区委员会”，但他们没有任何资格这样作，他们没有资格设立地区委员会，也没有资格让支部和党委会投票，这些支部和党委会在几个月以前便在正常的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他们的地区委员会领导机构。这个虚无缥缈的“地区委员会”的决议，被说成是比利时首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的言论。

北京领导人可能妄想以这种行动来使中国同志或者某些国家的消息不灵通的同志相信，他们的立场得到权威的支持和广泛的传播。但是，这种欺骗同分裂主义造成的真正危害只能导致争论难于进行，只能妨碍我们运动的国际团结，只能损伤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伟大共产党的威信。

（译自 1963 年 10 月 5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魯契亞諾·格魯皮

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筹备期間，集中討論的問題之一就是应当如何确定我們所处的时代的特征。

一方面，中国同志在自己的分析中（見 1960 年北京以《列宁主义万岁》为題发表的文章）仍然以列宁对他那个时代所下的定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为依据，另一方面，苏联同志跟大部分其他党的代表則指出，从列宁下定义的那个时代到現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且指出，一个广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如何要求对我們时代普遍的和基本的政治特征有一个新的看法和定义。

莫斯科會議声明說：“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这是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已經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至使我們时代具有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面貌。因此，就应当根据我們时代的这一新特点来得出这样的結論：有可能避免战争，把和平共处目标不是作为工人階級战略的补充物，而是作为这一战略的普遍原則。因此，中国同志之所以反对把和平共处作为工人运动政策的基本原則，正是因为他們沒有正确地掌握住我們时代的普遍政治特征，死死地抱住过去正确而今天已經过时的分析。

当时，中国同志並沒有把自己的立場坚持到底，他們接受了莫斯科声明中的提法。然而，他們对八十一个党會議上提出的定义表示这种贊同，是否使他們在自己的政治思想上进行了应

有的深思熟慮呢？

直到今天為止，中共所採取的立場說明並不是這樣，它證明瞭中國對我們時代定義的接受還是表面的。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最近中共給蘇共的二十五點信件，固然可以看到他們承認：“世界力量對比變化了，變得越來越有利於社會主義，越來越有利於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但是，這種表示同莫斯科會議的提法比起來已經沖淡了，最多也不過是關於我們時代的分析的一個補充提法，而不象在八十個黨會議文件中那樣（原應當是那樣的），成為這一分析的中心要點，基本的和涉及全盤的依據。

因此，中國文件中對我們時代基本矛盾的提法是靜止的，它不是去闡明目前形勢的新的具體特徵，而是把矛盾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看死”（甚至歪曲其真象）。

事實上，在中共的信中這樣寫道：“……當代世界的根本矛盾……是：

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

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

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

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提法吧。他們所提出的第一個矛盾（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是正確的嗎？我們認為不正確；相反，我們覺得它既離開了現實，又離開了莫斯科聲明的提法，而中國領導人聲稱他們忠實於這一聲明。實際上，我們覺得這種提法，完全忽視了資本主義的當前發展，忽視了它在向壟斷資本（也就是帝國主義）轉化。不考慮今天壟斷資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勢力之間發生的矛盾，相反，把一切資本主義勢力一律

看待，不加區別，那就是沒有把社会主义陣營和全世界勞動者的主要敵人——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性質的資本——孤立起來打擊它。（還應當指出，在二十五點中，絲毫也沒有提到壟斷資本最近向國家壟斷資本的發展，也就是沒有提到我們時代資本主義的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特征。）

在談到中共這一文件時，人們可以說，文件忽略了要把帝國主義孤立起來這點，這看起來可能象是荒謬的，但是確實如此。當人們從文件的具體字句去看一看在那些表示反帝立場的激烈言詞背後真正的政治分析到底是什麼時，就恰恰會看到這點。總之，由於中國領導人僅僅在表面上接受今天我們時代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在不斷壯大這一提法，他們把我們時代最普遍的這個矛盾，甚至不是糾纏在適用於列寧時代的那個提法上，而是糾纏在更早一些時候，也就是壟斷資本尚未成為統治力量的時代上。

無庸贅述，他們這種關於當代世界首要的普遍矛盾的定義，同文件其他部分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分析是矛盾的，從而削弱了今天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具有的作用。

這些提法不僅離開了現實，而且也離開了八十一個黨聲明。聲明寫道，占統治地位的矛盾始終是社会主义和无產階級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我們引述下面這句話作為例子吧：“在現時代，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內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點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體系，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等等。

第二個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无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提法，我們覺得重犯了第一個矛盾提法的毛病，它不考慮資產階級內部正在發展和日益加劇的分化，首先是不考慮資產階級各階層同壟斷資本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見1963年7月7日《困

結報》載弗朗科·卡拉曼德雷一文)。

中国领导人在这点上的分析也是不仅离开了现实，而且离开了八十一一个党声明。声明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基本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的同时，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在目前阶段也在加深。”

不止于此，整个工人运动的一个团结因素被削弱了，这是因为虽然正确地说明了帝国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可是后来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在本来应当把帝国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时候，却又看不清了。因此也就未能以必要的明确性阐明今天对国际工人运动整个战略来说所形成的客观的团结基础，尽管这一基础是在深刻分歧中形成的。

二十五点在这样描写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之后，马上又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

这句话好象纠正了前面的话。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客观性，而且还由于这句话使中国同志在分析中显露出的那种思想变化更为明显了。在后一个定义中，他们正确地谈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进而谈到它们的矛盾是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相反，在前一种提法（“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中，却出现了阵营同制度概念的混淆。所谓制度，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的一个经济分析的概念。所谓阵营，则是一个政治分析的概念，它说明政治力量的分布情况。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或混为一谈，就会恰恰使人忽视下面这一事实：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力量，可能由于垄断资本同其他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发生的矛盾而站到反帝阵营中来。

提出这样的意見，我們是否就是專門在術語問題上吹毛求疵的學究呢？但願如此。可是，當我們考慮中國領導人所作的整個分析時，就看到了，他們的分析主要是以我們認為應當受到批評的那個關於我們時代矛盾的定義（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為依據的。實際上，看不到壟斷資本同其他資本主義勢力之間的矛盾，並非是偶然的。他們無法理解我們黨政策的一系列決定性要點，也並非是偶然的。

把一切資本主義勢力——壟斷的和非壟斷的——全都看作是一個陣營里的，就必然失去理解結構改革政策的一切可能性。事實上，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由於壟斷組織同其他生產階層之間發生了矛盾，工人階級才找到了為實現結構改革進行鬥爭的可能性，結構改革不僅代表着勞動階層的利益，而且也代表着中等階層的利益，它將會限制和奪取壟斷組織的權力，與此同時，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作為支持和領導反壟斷經濟政策的工具。

把一切資產階級階層——那些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民主制度表達了自身利益的階層和那些為了取消或者從內部閹割民主制度而反對民主制度的階層——看成一丘之貉，就再也無法理解民主制度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而可能具有的進步作用，並且無法理解民主憲法怎麼能成為無產階級和中間階層達成一致的廣泛基礎，成為本着社會主義方向革新社會的一個聯盟的基礎。

這樣，社會向社會主義和平發展就變為一種假設，最多也不過是一種完全不可靠的假設，而不再是今天展現在工人階級面前的實際可能性了。

總之，沒有看到，在象我們這樣的國家里，工人階級為了使自己成為在爭取結構改革的行動中、在維護和發展民主制度職

能中正在形成的一个新的权力集团的领导力量（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而且最近的选举结果也说明了这点）而进行的斗争所处的实际具体条件。没有看到，今天工人运动有可能在反垄断斗争中结成比过去更为广泛的联盟的理由何在。

因此，人们也就落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近制订的文件，尽管在上面签了字。文件中提到了改革的进步作用——“实现这一切，将是社会进步道路上的重要步骤……”，也阐明了争取民主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联系：“共产党人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看作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

（译自1963年9月21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附：格魯皮給意大利《再生》周刊的信

亲爱的社长：

热那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莱夫勒罗、比尔蒂耐提和奥利亚尼同志给我指出了登载中国共产党给苏联共产党的二十五点信的《再生》附刊中的一个翻译错误。

中文原稿在分析我们时代矛盾时用的是这样一个提法：“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译文却说：“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可见，这就改变了提法。

这一翻译错误使我在9月21日《再生》上的文章中对中国同志的论点提出的一部分批评不成立。也就是说，认为中国同志在他的提法中没有把帝国主义阵营作为工人和民主运动的主要敌人孤立起来，并且把阵营的概念同制度的概念混淆，都是不对的。

我当然不低估我所犯錯誤的严重性。

但是，对中共立場的总的批評并不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种批評是实质性的。

下面这一意見是站得住脚的：中国同志在指出了第一个矛盾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之間的矛盾之后，在論证中却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置于其他一切矛盾之上，这就歪曲了我們时代矛盾的正确分析。

下面这一意見更是站得住脚的：中国同志用公式化和簡單化的态度錯誤地看待象我們这样的先进資本主义国家中出現的矛盾，他們把它說成是“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矛盾”。实际上，象他們那样做，把資产階級整个地同无产階級对立起来，就是无視現代資本主义朝向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无視垄断組織势力同其他資产階級阶层的矛盾，无視在資产階級中所产生的新的分化。正如我所說过的，这就意味着看不到，我們爭取結構改革斗争的根据及其革命性质正是在于資本主义先进国家里資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不懂得这些，也就意味着既不能理解我們时代的现实，也不能理解我們党的政策的实际內容。

魯契亞諾·格魯皮

(譯自 1963 年 10 月 19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进展和团结

意共中央 1963 年 10 月 24 日会议决议

几年以来，在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正在展开一次重要的辩论。最近，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维护的错误立场和该党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共产党所进行的攻击，论战和分歧严重地加剧，而具有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这给我们运动的团结带来了威胁。

为了正确地估计形势，必须始终考虑到：当前的辩论和矛盾是在劳动阶级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迅速前进这一历史时刻发生和展开的。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占人类三分之一以上、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存在的时代。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扩展到各大洲，并在进行斗争。老殖民主义制度正在崩溃，民族解放运动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目前，已经产生新的独立的国家，其中有許多国家在维护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正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这个形势的特点是三个基本因素：首先，我们的运动在客观上对广大群众和全人类——帝国主义仍然使全人类受到核灾难的无可比拟的痛苦和悲惨的前景的威胁——承担着新的重大责任。其次，在世界结构中发生的变化，过去和现在都愈来愈尖锐地促使我们的运动有必要正视和解决有关战略和斗争的分析和研究的新问题。最后，由于开始出现前进的新的可能和各个党的客观

条件、斗争目标和任务、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程度的不同，在我们的运动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十分复杂而不同的局面。这些因素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目前的争论和分歧的最深刻的根源和客观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这一长时期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说来没有及时意识到在世界结构和它自己的斗争条件中所发生的变化，没有及时由此得出理论、战略和策略上的必要结论。它在理论的制订、对世界和各国所发生的变化科学分析和政治进展方面都停滞不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火焰、反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和在争取所有工人和人民力量的团结行动中所采取的思想上的和斗争的立场没有有效地得到发展，人们特别是抛弃、甚至违背了这些立场。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最有成效的经验，为消除落后、错误和被证实了的衰退倾向，为克服错误的或过时的立场和为使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担负起新的责任和新的任务，向前迈进了伟大的第一步。因此，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所犯的错误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偏差、对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整个实践所进行的批评，二十大所宣布的（关于世界结构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性质和意义，关于战争的可避免性，关于和平共处政策，关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和关于党内民主的）新的立场和论点，被认为是我们整个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革新转折的开端而受到各国共产党的欢迎。

因此，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年采取的立场的严重性，首先在于这些立场对二十大开始的这个转折进行攻击和企图给予打击。必须击退和挫败中国同志对二十大的路线和对在实现这个转折

方面有功劳的一些苏联领导人所进行的攻击。人们不应从二十大的路线后退；人们能够而且应当前进。如果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进行自我批评的话，那也不是由于赞同二十大的路线，而是由于在行动和发展理论方面还没有从二十大确定的新方针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中国同志把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世界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任务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我们行动的这种必要性以及同二十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制订的新立场对立起来，他们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和破裂的边缘。

要了解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上这条道路的一切具体原因，是不容易的。也许这种推动至少部分地是从他们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建设的条件和困难，从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从中国领导人必须处理的问题之大以及从国际局势中（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政策不公正地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这种局势中）产生的。但是，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目前世界局势的基本特点、对今天参加反帝斗争的力量的配置及其重大意义和对为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所达到的程度所作的错误估计。同意这种错误的估计和中国同志从这种估计得出的路线，就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失。正当在我们面前可以展开取得新的胜利和进展的前景的时候，首先，这种同意会阻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和责任，并且也会削弱和损害各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我们党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及其胜利对于各国人民的伟大意义。但是，它坚决地拒绝中国同志目前的立场和他们提出的路线。它将尽力对我们的运动中正在进行的辩论作出贡献，以便维护正确的革命战略并使之

取得胜利。

在进行这种不可缺少的政治斗争时，还应当认识到，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摆着有关研究、探讨和行动等新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严肃地和勇敢地处理这些问题并继续前进的能力，是击败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立场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另外我们认为，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必须寻找和遵循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要使为争取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得以开展而不引起分裂和破裂，而且以符合当前情况的办法和方式努力达致必要的团结。

在这个文件中，我们党打算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目前正在进行辩论的主要问题的实质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立场和主张。

一、为争取和平和争取共处制度而斗争

1. 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使人类摆脱了大气层和海水污染的祸害和危险。这个条约的第一个和当前的意义就在于此。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长期斗争的和平力量、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应当认为三个原子大国宣布放弃试验一事是它们斗争的成就和对各国人民有好处。这些试验会严重地损害人的健康，是对人类命运的威胁，而且显示出今天爆发一场世界性冲突可能具有的那种普遍毁灭的性质。停止核试验之举承认了这个事实：新武器的数量和威力已达到和超过了这样一种水平：无论是为防御目的还是为报复目的，都再也不能为扩军竞赛进行辩护了。在这时候，假设爆发一场使用核武器的战争，那么就有可能不仅变成交战国的互相毁灭，而且造成人类很大部分的死亡。

我們认为，低估原子战争的灾难前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工人和人民运动中出现了这种错误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对它进行了谴责。甚至那些要人们不要夸大一場冲突的结果的人，如中国同志，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一場战争，那么半数以上的人就会死于原子浩劫中。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断言——根据这个断言，人类剩下的人将能够迅速地重新走上他们的道路，以便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更高的文明：社会主义的文明——是一种荒谬的和危险的幻想。事实是，原子的烈火只能使主要的和先进的文化中心被摧毁，并且可能损害自然界和人的生命的根基。

承认战争手段的这种质的变化，由此而承认战争性质的改变，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如同中国同志坚持的那样，得出了历史进程不再由人民群众力量决定的结论。问题不在于承认或不承认，技术能够征服或制约人，而在于承认或不承认，新武器的摧毁性力量是事实。人不是通过否认和空洞地任意低估这种现实去完成其历史主角的任务，而是通过为打击、减少和消除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这种制约和威胁而进行的斗争去完成这个任务。

只是对战争的灾难性质的认识这一点，当然不足以保卫和实现和平。但是，当中国同志担心这种对当前危险的明确认识会使群众和人民听天由命和产生恐惧性的怯懦的时候，他们错了。恰恰相反，这种认识在世界上扩大，是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的政治危机最深刻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它引起了它们队伍的分化和矛盾，同时成为一种动员维护和平的必要力量的推动力，而且这种推动力已经广泛地生效。

保卫和平具有极普遍和决定性的价值。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选择（我们党长期以来也这样做，而且我们是首先这样做的党之一）的价值和力量就在于此，它把保卫和平、使各国人民摆

脫国际紧张局势和扩軍竞赛强加于他們的苦难和使人类摆脱原子灾难的威胁的任务，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一貫为制止帝国主义訴諸战争的工人阶级，今天能够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更人道的、更普遍的保障和平的需要完全结合起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60年12月的莫斯科声明中明文指出的“是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这一抉择，着重表明了原子时代，和平和共处的目标对于所有的人、对于各国、对于那些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和那些没有新武器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都是不可更改的需要。

现在，把世界冲突排出人类生活之外，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这样做，是由于发生了历史进程在客观现实中决定的两种基本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同过去一样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它也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体系了。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发明、完善和发展，改变了战争性质。确定以争取和平共处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轴心的政治路线，正是从这一点产生的。这条路线保证了首要的利益——和平，并且为争取劳动人民的解放、争取被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解放、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和发展的斗争提供最适当的场地。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可能被推入最尖锐的矛盾困境中去，历史的发展将它引到这种矛盾中。事实上，帝国主义领导人不得不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一场战争对于他们的国家本身也是一个灾难。而这种承认使得揭露和揭发任何侵略和战争挑衅政策更容易了，而且在这些领导集团中造成新的分化，特别是为集结一致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接受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竞赛，从而接受共处政策，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个根本目标。另外，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是符合它们的性质的，并且也是符合整个工人运动所遵循的和平原则的。和平

共处正在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斗争和战胜资本主义的場地。

2. 和平共处要通过斗争来建立和取得。为了获得核裁军的虽然是有限的和部分的結果，必需采取艰难的和互相配合的行动，包括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和政治倡議到人民群众和和平运动的斗争，从最觉悟的科学家对輿論的动員到宗教势力的干預。制止冷战所引起的抵抗、矛盾和論战，可以衡量出斗争随着要达到的目标逐步向前推进而加强和扩大的程度。

中国同志的錯誤，在于低估文明的世界性价值，同时低估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制度的斗争所固有的反帝和革命的内容。争取和平和争取共处的斗争，不仅不、而且不可能同争取工人阶级、被剝削群众、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相抵触，而且它还为这些斗争开辟新的道路，同时，它还从这些斗争和这些成就中得到推动和力量。模糊争取和平斗争的世界性的和革命的价值趋势，把共处政策同独立和解放斗争对立起来的趋势，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正当初具規模的緩和措施证明有可能孤立和打击帝国主义陣营中最富于侵略性和极端的集团的时候，这种趋势削弱着运动的团结，減緩运动的势头。今天，害怕緩和的心理正在促使西德、戴高乐法国、佛朗哥西班牙、欧美軍国主义和大資本保守势力，公开反抗旨在代替原子竞赛和冷战的办法的一切趋势和一切尝试，甚至当这种趋势和尝试正在美国领导集团内开辟道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这意味着，继续緩和国际关系、强令执行和实现裁军措施，就可以促使资本主义政治和經濟的矛盾发展到最尖銳的地步，就可以促进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并使工人运动創造新的条件和新的可能性，以便在争取和平、反对垄断資本、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和剝削的斗争中实现更广泛、更有力量的社会和政治諒解和联盟。

和平共处是一种竞赛制度。共处将为人們創造条件，在这些

条件下，爭取各国人民解放和爭取社会主义的階級斗争将在沒有原子毁灭詭詐和冷战固定化的情况下，再次取得充分的自主和新的發展可能性。我們拒絕和反对帝国主义陣营內提出的关于共处的狹隘的“外交的”、极端保守的解释；这种解释把共处归结为各大国間就保持現狀、两个陣营瓜分势力范围达成協議，以便建立靜态的均勢，并最后建立防御和保证帝国主义目前統治的范围的体系。

我們提出的共处，既不是建議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休战，也不是建議二者之間妥协。我們所提出的共处，也不是建議放弃或和緩工人階級及其革命先鋒队进行的社会、政治、思想斗争。相反地，正是为了明确在世界范围内和在各国中进行的这一斗争的意义，明确工人階級、劳动群众、民族解放力量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的意义，我們认为，把共处概念縮小为沒有全面战争状态这种最明显的說法，象中国同志作的那样，是錯誤的。

誠然，和平共处制度首先意味着，資本主义国家陣营和社会主义国家陣营不用战争来把它們各自的制度强加于人。但是，只有人們达到了逐漸推进的目标，才能保证得到上述結果。这些目标是：通过談判解决爭执的問題，消除世界战争的遺迹，解开冷战之結，确保各国人民政治、經濟完全独立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之权。應該猛烈反对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歧視，應該取消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荒謬的不承认和排斥。必須采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通过一系列的环节和部分的成就——从締結两个軍事集团間的互不侵犯条約，到建立无原子区、拆除在外国的軍事基地、禁止制造原子武器和銷毀現存的原子武器——，直到取消对立的軍事集团和求得全面有監督的普遍裁軍。总之，这就是要实现一种国际关系的組織，在这个組織里，一面坚持工人运动的反对輸出革

命的立場，同时，要使帝国主义力量发动全面战争和輸出反革命变成实际的不可能。

共处綱領應該如上所述；对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來說，今天的問題就是坚决实现这个綱領。不要迟疑，在停止核試驗开辟的总路上前进；这就是基本的。

认为国际緩和的实现会阻止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是錯誤的。实际上，事实表明，各国人民的斗争的种种障碍是来自冷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冷战赋予了最反动的侵略集团以力量和活力，而且是使一切保守力量在这些集团领导下，依靠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或公开的干預来团结一致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一个基本因素。冷战也有助于加剧人民群众内部的分裂和深刻裂痕，并使这些分裂和裂痕固定下来。这一点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里的工人和人民运动在經過斗争和日益开展团结和广泛联盟政策之后，成功地經住了考驗，并成功地推动了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

冷战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处境的影响也是沉重的。亚、非、美洲的許多国家取得独立，是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而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的胜利和給予的声援也对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是，新国家的解放和建设运动，是同冷战政策抵触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冷战政策来扩大它們对争取独立斗争的国家进行镇压和武装干涉，而且冷战政策还使这些国家中的許多国家争取摆脱压迫、穷困、落后状态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漫长。

中国同志說，和平共处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代替办法。各国人民获得独立的必要性和权利，甚至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来获得独立的必要性和权利，都是不成問題的，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問題。相反

的，和平共處路綫的目的，恰恰在於使人類歷史的發展免于原子訛詐，確保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有充分的自主來進行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鬥爭，而又不因此而冒人類毀滅的危險。事實是，如果人們不願意光憑口說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和解放運動，如果人們真的希望開展革命鬥爭，那末，今天就必須消除冷戰和原子威脅訛詐的障礙。

3. 人們清楚地看到了由於中國同志猛烈地荒唐地譴責禁試條約、對蘇聯進行下流的攻擊的錯誤立場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中國共產黨人不顧明顯的事實，不承認工人運動所進行的鬥爭的意義，他們甚至否認停止核試驗的直接好處。由於他們把他們先前說成是“純粹的幻想”的全面核裁軍的最終目標同部分的然而具體的和積極的禁試條約相對立，因而很快地陷入了最明顯的矛盾。

他們所以拒絕這個條約，還因為這個條約具有開始和促進在國際關係中走向緩和的轉折的政治意義。

通過拒絕這個條約，中國表明它要求擁有自己的核武器，並譴責蘇聯沒有允許或者幫助它實現這個目標。必須拒絕這個立場。蘇聯有任務——它以很大的努力和犧牲完成了這個任務——建立一支核力量以便能保衛它自己 and 社會主義大家庭。但今天，在核武器增多的危險面前，它過去和現在都有義務，避免作出一切可以被用來作為進一步進行擴軍競賽和在帝國主義陣營中擴散核武器的借口和根據的決定。這不僅是一個負責的一貫的政策，而且是唯一能夠導致爭取裁軍和和平的鬥爭取得勝利的政策。當中國共產黨人要求使他們的國家擁有自己的核力量時，如果人們不願設想他們不相信蘇聯保衛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諾言，或在威信和力量方面追求一種特殊的地位的話，那麼，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共產黨人根本否

认裁軍斗争的任何意义和任何可能性。

誠然，他們說，提出普遍裁軍的建議——他們自己已提出这种建議——是适宜的，迫使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接受“某些協議”也是可能的。但是，当他們同时又宣称在帝国主义还未被彻底打倒时要想实现裁軍和巩固的和平只是幻想的时候，他們所作的事实上並沒有超出进行鼓动和政治揭发的范围。这样，他們就使下述革命斗争战略成为問題，并在实质上拒絕这个战略，这个战略是以和平共处为樞紐的，它設想通过这样一个运动前进到社会主义，这个运动触及今天所出現的階級矛盾和各国人民、各个国家之間的竞争的各个方面，并通过一系列的成就前进。中国同志根据不使革命运动的发展服从任何其他要求的抽象主张，糾纏在把和平同革命人为地对立起来，使自己沒有任何可能通过旨在孤立战争力量和扩大和平、反帝和民主力量战綫的行动来干預具体的形势，而終于把賭注押在这样一个政策上，这个政策在客观上是以加剧紧张局势，归根到底，是以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冲突为前景的。

共产主义运动，我們的党應該极明确地拒絕这种徒劳的、冒险的前景。

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道路

1. 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同志否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道路的可能性这一立場是錯誤的、有害的。

这表明中国同志沒有理解世界結構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全部意义。这表明中国同志既沒有看到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胜利，工人和人民运动今天可以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采用新的斗争形式，更沒有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

化要求調整和发展工人階級的战略策略。

今天資本主义的統治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工人和人民要求的压力、技术进步、两个制度的經濟竞赛而产生的推动力和其他因素，近年来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生产力发展了，資產階級統治集团曾經試行一些經濟政策路綫(資本主义“规划”形式，发展国家資本主义，設立超国家組織等等)，这些路綫影响了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机的方式和速度以及就业水平，扩大了国有經濟領域，加强了經濟国际化过程。另一方面，經濟发展的方向和特征是垄断資本的日益集中和渗透这一事实使国与国之間以及本国内部的不平衡严重化了，新的矛盾和新的需要产生了，并使社会和人付出了新的沉重的代价。資本主义对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剝削和压迫，但是其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变得更为复杂了，并且利用政治行动和国家行动来进行不断的、各种形式的調解。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中，不論在社会上还是在国家和政治制度上，种种分野和关系都变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了。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工人階級扩大自己的联盟体系，采取恰当的斗争方法。工人階級不仅必須而且也可以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条道路的基础是不仅同农业无产階級和貧农結盟，而且同广大小农群众、同城乡广大中間阶层和知識分子結盟。爭取具有經濟和政治內容的局部性和过渡性目标的斗争，对于組成上述联盟、孤立大資本、粉碎資產階級集团、贏得反垄断資本集团的更先进地位、完成国家的民主改造、实行給工人階級开辟掌透政权的新道路的經濟社会改革來說，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經驗证明，在世界范围内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表現在資本主义灾难性的总崩潰上，而是表现为革命斗争和成就的交錯，这些革命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发展着，它

們相互影响，奔向同一个目标。

这就要求深入地研究各国和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所表现的民族具体特点。有一种战略把革命斗争缩小到只有十月革命一种形式，不论什么情况都是这种形式，这种战略不符合实际情况，压制共产党的行动、积极性和政治作用，促使它们只是进行宣传和消极等待。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绝不意味着把革命运动分割成许多互不相干、自行其是的斗争，而是一条有效地干预现代世界的各种矛盾的道路，是一条不仅仅依靠社会主义世界的胜利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制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战略的道路。

2.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认为：今天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有可能走上民主与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中国同志随意毁谤和歪曲我们的立场，把民主与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说成仅仅是竞选斗争、仅仅是议会活动的道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和平的道路是指一条引导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不通过武装起义和内战而夺取政权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是由既深且广的、不断的群众斗争构成的。我们所说的是一系列斗争，它在各方面打击着阶级敌人，形成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运动，这一运动不论在生产场所、公民的社会组织、政治选举、议会或是国家机关方面都能够进行干预。通过这些斗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努力不仅仅是争取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把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周围，而且也争取推行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改革（土地改革、国有化、经济民主规划等），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条件，同时触动所有制和国家组织。这一战略与中国同志硬加在我们身上的放弃斗争政策恰好相反，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战略：从现在起就展开争取政权、争取劳动阶级进入国家领导的斗争。

此外，种种事实也回答了中国同志令人可笑的捏造：近年来工人阶级、意大利人民运动和我們党的整个行动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英勇的群众斗争，从抵抗运动期间对法西斯暴政进行的武装斗争到争取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大规模人民运动，到声势汹涌的经济政治罢工，到推翻塔姆布罗尼政府的1960年7月街头的流血示威，到竞选斗争（这一斗争使意大利几个工人政党在全国和地方议会中拥有资本主义国家中从未达到过的那么多的代表，那么大的力量），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

因此，议会活动和保卫并扩大民主权力的斗争仅仅是意大利工人先锋队为了开辟取得政权的道路和改造社会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关于这个方面也必须十分明确。我们拒绝中国同志的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低估了为了发展和改造政治民主机构、给这些民主机构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把这些民主机构与劳动者争取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同志的这种立场一古脑儿地把议会组织、各级选举议会、某些自由权利，从来没有过或者完全不稳固的情况，同上述成果和机构在广大群众的思想、斗争和經驗中根深蒂固的另一种情况混为一谈。中国同志的这种立场忘记了宗派主义地低估民主成就过去曾经严重地削弱过工人运动的反法西斯斗争，忽视了如下事实：今天在资本主义西方（即资本主义的堡垒），还存在着法西斯和专制制度，如果工人运动及其先锋队不彻底地、毫无保留地致力于争取民主和民主力量团结的斗争，法西斯和专制制度就不能被打倒。

我们认为，今天在一系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大垄断资本统治的斗争，争取人民群众多数和建设新社会的行动，能够而且应该通过代议民主机构各级政治选举议会以及与此有关的自由权力加以发展。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客观上和主观

上的整个变化，使国家制度和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公有经济部分、国家对经济和生产的直接干预、国家资本主义等都大大扩展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一系列经济要求也涉及到政治领域。一系列政治成就对经济也起着而且可以起新的影响。

与此同时，工人和人民运动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即使各国的规模各不相同。在许多国家，今天有一个广泛的工会组织网。联合组织出现了，这些组织聚集着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把生产者和消费者阶层组织起来，目前社会的客观过程愈来愈促使这些组织摆脱本位的和经济的狭隘观点，而投身到有关社会的方向和整个制度的斗争中来。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壮大了，它们不仅能提出阶级的和革命的正确方针，而且还能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经常的斗争，从而弥补选举议会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在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议会斗争二者之间建立不断的联系。这种经验和状况虽然还是局部性的，还只局限于某些国家，但是已经指出新的斗争方式和场所，通过这些新的方式和场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可以打击垄断组织的权力、官僚机关和军事与保守集团的地位。

由于这些发展和变化，我们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探索和试验新的道路，以便改造国家，夺取政权和组织政权。我们很了解，工人阶级的意愿并不足以确保或多或少和平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走这条道路是我们自己提出的目标，但不是肯定能走这条道路。我们亲身经历过法西斯暴政的悲惨经验；我们知道，反动集团使用武装暴力、扼杀民主自由以便阻止人民群众前进的那股倾向是多么顽强，多么根深蒂固。但是，我们也知道，争取民主的斗争越强大越广泛，各阶层人民对自由权力的渴望越深刻，工人阶级越能在民主斗争的火焰中建立起广泛的联

盟体系和巩固的联合組織，那么工人階級也就越能够、越善于用一切必要手段来击败反动势力所使用的暴力。

探索掌握和管理政权的新道路，今天对于同一些社会和政治力量进行积极的討論來說，具有重大意义，在先进資本主义国家，这些力量是建立新的权力集团所必不可少的。在西欧，破坏資本主义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权力基础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不仅應該保证面包和工作，而且應該有能力保证高速度的生产发展，实行經濟规划化（个体的积极性会在其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并得到鼓励），有能力通过确保广泛实行自治和政治自由的制度来领导社会，推动文化的自由探索和思想的不断交鋒。我們只有从現在起就朝着这一方向、这一前景去行动，才能充分地回答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趋向，才能爭取和团結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大多数。过去，那些不懂得这些要求的宗派主义观点曾造成很大损失。現在是从事实中吸取教訓的时候了，是考虑使工人运动在先进資本主义国家遭到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主观缺点的时候了。

我們感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們應該正視这些問題；我們确信，正視这些問題并在爭取民主的斗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間建立牢固的关系，是朝着工人階級的政治团結和民主力量的团結迈进进一步的必要条件。我們不能忽視社会主义运动和天主教运动在西欧工人階級中是有力量和根基的，否則我們就会犯列宁主义恰恰根据第一次大战后的經驗严厉批判过的那种左派幼稚病。現在就更不能够、更不应当无視这些問題，因为痛苦的經驗正使得工党运动内部、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意大利天主教运动内部产生一些新的因素和新的立場，西欧工人、民主分子和一切左派力量起来斗争的需要正在具备新的现实意义。

我們以为，恰好在目前这个时候，中国同志的教条主义立場显得更加有害，因为目前需要促进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的探討，深入地分析当代資本主义，以及資本主义世界中发展着的新变化和新矛盾，目前資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需要更加深入地掌握本国的具体现实，扩大同还没有信仰社会主义的群众和其他民主力量的接触，发展共产党組織的人数，号召共产党员加强自己在民主和階級的联合組織中的地位 and 行动。

在一个对工人运动的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問題上，即在有关世界范围群众組織的团結、性质和目标的問題上，中国同志的立場导向一条完全錯誤的路綫，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应该拒絕把世界范围的群众联合組織当作党的政策的反映和工具的任何傾向。中国同志不仅具有这种观点，而且近年来还致力于把这些群众組織变成他們給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特殊政治路綫的工具，从而危害到这些組織的团結。

意大利共产党人将进行斗争，以便使这些組織的自主性得到确认。大家承认和尊重这些世界群众組織的自主性是使它們能够扩大自己的基础和統一行动，因此也就是使它們能順利地进行爭取各自特定目标和爭取广大人民群众所向往的和平和进步总目标的斗争的必要条件。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我們才能够扩大同其他世界群众組織的統一行动形式，或者国内的統一运动，粉碎人为的障碍和歧視。

3. 在关于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前量問題上，也需要进行新的探討。数以亿計的人們和整块整块的大陆取得完全独立和摆脱帝国主义統治所造成的飢餓、落后和被剝削处境，是我們时代的首要問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意义也正表現在它有能力正視和解决这个巨大的問題。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若不同被压迫人民結成联盟，就

无法想像打倒帝国主义，正像爭取彻底解放的被压迫人民需要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一样：这是列宁主义的伟大教訓。

近年来，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进一步扩大其活动范围，通过一些伟大的胜利乃至失败取得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經驗。有些国家的人民仍在进行英勇悲壮的斗争，爭取独立的权利，反对极端野蛮和血腥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統治形式。另有一些国家的人民刚刚取得独立，面对着有关經濟建設和建立最基本的文明制度及国家体制的重大問題。还有一些国家，它們的反殖民主义組織已經执政多年，經濟恢复和规划化的經驗达到了必須做出决定性的政治和阶级选择的紧要关头。古巴正在建設社会主义。从英勇的解放战争中产生的年青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也信仰社会主义思想。为了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可怕落后状况，經濟发展的方式、速度和目标問題，在各国都有着重大意义。

因此，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形势变化多端的图景。制定和执行一种能适应千差万别的形势、善于对付和击败帝国主义集团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并建立新的地盘而采用的种种手段和伎俩的战略，乃是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项繁重而困难的任務。

因此，根本問題是去研究現在帝国主义集团根据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形势怎样把那些老一套的镇压和暴力形式与新殖民主义渗透的新方式交織在一起。实际上，甚至在那些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企图阻止、限制和抹煞国家独立成就的同时，今天还采取了同过去那种純粹的經濟掠夺有所不同的渗透形式（工业投資、資本渗透、同官僚资产阶级乃至农业或工业资产阶级請求妥协等新手段），力图間接地但是决定性地左右这

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基本选择，确立宗主国奴役殖民地的新形式。寻求这种新的奴役形式的根源，也在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经济方面的客观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结构上的新要求。

根据帝国主义集团这种花样繁多的政策（从在安哥拉的殖民恐怖到一系列非洲国家加入西欧共同市场，到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到支持印度新的垄断资本集团），根据解放运动所达到的广泛程度，有必要重新研究各国的阶级联合、斗争目标和斗争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组织形式。解放运动今天在上世界上所触及到的地区和社会及历史方面的情况，远远超出第三国际据以进行工作的经验和情况。首先，各国资产阶级集团的影响、性质和政治倾向，随着所涉及的是印度还是埃及，是阿尔及利亚还是几内亚，是巴西还是刚果而大不相同。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集团与帝国主义正打得火热；另外一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渗透，另一方面却又坚决反对社会改革纲领；还有一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重要势力和先进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和反帝斗争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的榜样推动下倾向于经济规划和先进的社会改革；最后还有一些国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一种大体上还是部落性的结构，甚至看来很难说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影响、数量、自主性和政治地位也随各国而大不相同。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工人阶级。农民群众愈来愈广泛地参加反帝斗争，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农民群众曾经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力量，是促进运动本身急剧发展的因素。因此，有关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反封建的斗争和向社会主义前进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从这一阶段向另一阶段过渡的新问题就出现了。反帝运动的发展及其先锋队形成的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

都具有独特的和錯綜复杂的性质。

因此，中国同志硬要在这个問題上也把革命路綫压缩成一个唯一的模型——即使是中国革命这个伟大模型，这种企图是錯誤的，它沒有抓住形势和任务中的新因素。因此，中国同志所极力鼓吹的革命号召，如果不与建立符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新力量集团联系起来的話，那它就会是抽象的，它可能导致严重的极端主义冒险。因此，中国同志教条主义地拒絕探索新事物的結局，必然是自己变成运动发展的沉重障碍，即令他們自己說要推进它。

我們不想教訓任何人。我們所肯定的是需要进行批評性探討，因为我們感到資本主义世界工人階級所肩負的責任，同时也看到西方工人运动給予殖民地革命的援助是非常不够的，看到这种援助的缺点、甚至所犯的錯誤。但是，仅仅对爭取独立的各国人民进行政治上的必要声援是不能打倒西方工人运动队伍中表現出来的那种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立場的。任务要更加广泛，更加伟大。西方工人階級的責任在于組織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集团所使用的新旧干涉手段，从而使西方工人階級的斗争和殖民地革命具体結合起来，反对以国际大垄断組織为代表的共同敌人。

4. 也就是根据这种要求，我們认为，中国同志向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总战略是片面的、錯誤的。中国同志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区說成是“世界革命风暴中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終要以这些地区为轉移。这样一来，中国同志就把殖民地革命、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放在优先和领导地位。这种战略路綫大大低估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完全忽視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濟竞赛方面的成就和胜利对于证实社会主义理想、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乃至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击败帝国主义

的經濟訛詐和反对新老形式的帝国主义渗透等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同志的战略路線完全无视苏联和苏共在客观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无视苏联和苏共的胜利给予社会主义陣营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力量，无视苏联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艰巨和复杂的工作对我们整个运动的前进所具有的意义。中国同志的战略路線同样也低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低估这个斗争在帝国主义的老巢从它的經濟政治权力根源方面打击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低估这个斗争在粉碎新殖民主义政策更阴险更现代化的手段方面所能和应作的贡献。

但是，中国同志立場的最严重錯誤首先在于，这个立場模糊了社会主义陣营的行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人民运动的斗争、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三者之間应该有的那种統一关系。

問題是政治性的。中国同志的路線有使解放运动本身遭致失敗和发生危机的危险。事实正在证明：仅仅依靠世界革命动力中的一种力量行动起来去击败帝国主义的一切观点，都是有缺陷的和錯誤的。我們认为，在西方工人运动的某些部份表现出来的那种企图把殖民地革命的命运和发展从属于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立場是錯誤的；我們同时认为，把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仅仅寄托于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濟成就，也是錯誤的和有缺陷的。但是我們认为，把民族解放运动当作世界革命的軸心和打垮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的那种立場，同样是錯誤的。想要点滴击潰和逐步取消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地位来打倒帝国主义的战略，乃是一种殘缺不全的战略，它不从根基上打击帝国主义，不調动解放运动本身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巨大問題而需要的一切力量。除非是想最后用全面武装冲突来孤注一擲。但是，我們拒絕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各国人民的解放寄托于經受

原子灾难考驗的那种前景。社会主义應該而且能够在和平中获胜。

三、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

鉴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有必要在新的方面探討和寻求依靠重复书本上的一般公式并不能使之出現的解决办法，这是保证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前进以及在它們之間建立巩固的相互合作体系的条件。

苏联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所走过的英雄伟大而又艰苦卓絕的道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尽管也是困难重重、其性质却又常常并不相同的經驗，以及今天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出現的困难和矛盾，首先证明了必須消除一切对社会主义建設問題神話式和簡單的看法。必須理解，就連社会主义建設問題，今天也应当針對它們的复杂性，以豁达的精神和敢于批判的勇气予以对待和研究。但永远也不要忘記在建設摆脱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压迫的新社会中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成就，永远也不要模糊了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那条明确界綫的含义。

工人階級的掌握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經創造了并且正在創造着解决自由和正义、福利和文化、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和亲密关系这些重大問題的客观基础，任何一个过去的人类社会都无法解决这些問題，資本主义也是如此。事实本身表明了社会主义各国（苏联走在最前面）为了正視和解决这些問題，从一个最落后的局面出发，克服巨大的困难，在四分五裂、滿布帝国主义挑起的可悲的騷乱的世界所走过的伟大历程。

但是，經驗也表明了，这一历程并不是平坦和笔直的，它在

过去和现在都是困难的、遭到反对的、受到磨难的。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取消了旧剥削阶级，被分割为几个阶级的那种社会所固有的矛盾被消除了，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推翻社会结构。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并且表现出尖锐和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即：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段长时期内，不同的社会阶级也要继续存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各个部分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出现之后，一个和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基础和经济发展方面也是不平衡的；新旧民族矛盾；过去的遗产和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发展方面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所起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主观上的因素和缺点，这是由于革命进程在各国具有不同特点，由于各国党阶级觉悟和文化、政治思想修养性质不同和发展水平不同，由于斗争经验的特殊性，由于每个党在把这些经验同世界其他地区所取得的经验结合起来从而真正从世界范围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必须到所有这些因素中去寻求今天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困难、问题、摩擦的根源，并且寻求（更普遍地说）作为社会主义各国发展道路特征的那种深刻差异的根源。不懂得这些差异是目前形势的一个客观事实，看不到一系列国家在按照自己独特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严重错误的根源。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必须拒绝中国同志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正在复辟的国家，以这种方式重复并且变本加厉地谈论各国共产党认为是错误的评价值和看法。

消除目前的困难和摩擦的途径并不是进行谩骂，更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挑起争做领导党或者领导国的斗争（象

中国同志似乎要做的那样)。这条道路只能导致严重的冲突、有害的四分五裂。相反，正确的途径是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全部问题、它们的根源和联系，针对它们的原因，以远大的眼光以及明智而现实的行动努力去解决它们。在我们看来，由于民族性质的原因和情绪今天在社会主义体系中（不止于此，更广泛地说，在现今整个世界中）所起的影响而被揭示出来的一整套问题，无论在它们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治和实践方面，今天应当特别地予以正视。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民族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将会在长时期内起巨大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在这方面，由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组织和领导的特殊方式，和由于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过去和最近所犯的错误，是否会产生障碍，以及这些新的障碍是什么。总之，这里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尚未妥善地探讨过的整个领域，而这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充分贯彻国际主义原则和实践却是主要的。此外，还有一些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进步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同上面这个问题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寻求更先进的国际分工形式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确立和实行始终一贯地以相互支援而且以完全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关系问题。

如果社会主义各国之间不实行经济和发展计划的有机协作，那末，就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各国能实现今天被提了出来的宏伟目标。这种协作——通过国际分工——能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更高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更迅速的增长、高水平的技术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克服这方面存在的严重落后现象，无论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的互相援助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给予争取经济独立，更广泛地说，

爭取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競賽取得勝利的各國人民的援助來說，都是基本的。另一方面，關於社會主義陣營中發展國際分工的決定，如果要成為正確的和有效的，只能夠而且也只應當通過協商和民主決定制度來作出，社會主義各國以對等的條件，本着達到相互諒解的精神，參加這種協商和民主決定。

這種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各國人民和各個國家之間合作的方式和方法，並非一天就能形成的。當問題從簡單的經濟支援形式過渡到有機協作的措施，並且需要克服原來已形成的局面、落後現象以及過去所犯的錯誤時，建立這種合作方式似乎就更加複雜和困難。但是，如果規避社會主義世界勝利所造成的新問題和新情況，必然會招致嚴重的損失。比如，當蘇聯規劃並且着手解決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過渡的艱巨問題的時候，這一問題是由於客觀需要，由於社會主義建設所調動的力量本身，由於整個蘇聯社會的成熟，也是由於同資本主義競賽的需要而提出的。蘇聯各族人民對更多福利的要求是由於已經成熟的新的需要，由於群眾對這些需要的認識，由於不能壓抑的進步意志而產生的。要求蘇聯各族人民等待是荒謬的，也是辦不到的。相反，應當要求蘇聯各族人民勇敢和始終一貫地前進，因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進行反帝鬥爭的各國人民從它們新的成就中可以得到鼓舞和幫助。相反，應當致力於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實現一個民主的合作制度，這一制度能本着鬥爭和共同事業的利益，不時地在各國不同發展需要之間進行全面而正確的平衡。

克服並徹底清除長期以來無論在蘇聯國內還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模糊了社會主義理想和損害了經濟建設及民主發展的那些非法限制和違反民主原則及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不僅對經濟進步，而且對社會主義各國以及整個國際工人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來說，都是具有根本重大意義的。這些嚴

重的畸形現象大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影响在世界上的扩大，它們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敌人的一个武器。随着社会主义各国經濟建設的发展，越是能够使丰富的民主生活相应地发展，使这种民主生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現出来，我們的理想在还受着資本主义統治的国家中的进展就会越加可靠。

因此，中国同志为同个人迷信相联系的方法作辯解是錯誤的和有害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并且使更多的群众参加制訂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根本性决定，对于使社会主义制度發揮其全部創造力量來說——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創立新的文化艺术方面——是极其必要的，可以在全世界把千百万人爭取到为了正义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来。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問題

1. 面临对我們的运动提出的重大而且严肃的問題，面临目前存在的分歧，各国共产党之間的辯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应当通过政治和思想探討、通过要求每个党为之作出貢獻的經驗和意見的比較来爭取并建立圍繞正确革命方針的团結。但是，辯論和政治及意識形态的斗争必須以避免使局勢恶化和分裂的方式来进行，这点十分重要。任何下面这种立場都是完全錯誤的，即：由于今天存在的种种困难、分歧、差异，竟然在国际上放弃爭取共产主义运动意識形态和政治团結的工作和斗争。中国同志今天进行的分裂和派系性质的活动，必須作为真正企图破坏这一团結的行为而予以拒絕。

对我們共产党人來說，国际团結和支援是我們思想概念的一个組成部分和不可放弃的部分；是每个共产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及和平共处、爭取各

国人民的解放、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整个战略之根本性基础；是成功地解决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新任务的条件。削弱这一团结就只能对帝国主义势力有利，事实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在于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指导各国共产党的学说。由于阶级敌人的侵略性及其力量，这一团结成为必要。

但是，对这一团结的问题、形式、性质，今天却不能以旧眼光来看待，而只能这样来看待：考虑作为目前形势特征的一切客观与主观的新因素。因此，我们首先重申，要人们回到过去存在的那种组织形式上去，简直是难以设想的。在目前条件下唯一可以想象的、现实的和必要的东西，就是在差异和自主中的团结。

要求我们运动的团结与要求各党自主和独立之间并没有矛盾。实际上，各党自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而且也应当意味着即使在进行必要的辩论和意见交锋时，也要完全尊重一个党不干涉其他党内部生活的原则，意味着各国党在本国人民面前仅仅对自己的政策和它对整个运动的总方针的发展作出贡献负责，而不能对其他党的任何一个立场或行为直接负有共同责任，因为它并没有参加有关这些立场和活动的决定，况且这也违反指导我们运动的总原则。然而，自主首先意味着在各国探讨使各国党充分按照各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行事从而使自己成为工人和人民群众运动领导力量的那种革命战略与策略、前进道路、斗争形式。对于正在全世界进行着的反帝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有个总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与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劳动者、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在斗争中的团结，是各国党为自己的进程制订革命路线的探讨和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主要部分。我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这样来看待自主，并且将继续实现我们的自主。

这样看待自主，就絕不会被推向狹隘的民族关門主义立場。相反，这种自主成为各国党可以对制訂共同的总战略、发展学說、发展我們整个运动和建立更巩固更高一級的团結作出最大的具体貢獻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2. 就是在差异和自主中团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們认为应当着手解决各国共产党之間接触和合作的形式問題以及有关我們运动內部的辯論方法和語調問題。

我們党认为，各国党之間的接触、辯論和合作的主要形式必須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来建立。这些关系必須不是形式地規定和組織起来的，而是要做到能进行真正的辯論和立場交鋒，能就爭执和分歧問題进行公开的、兄弟般的討論，能对彼此的情况和經驗进行客观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在双边关系和交換代表团方面，我們党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打算繼續并扩大这一活动，派代表团去社会主义各国以及西欧各国，更加經常地邀請并接待其他党的代表团到我們国家来，并且通过这一途徑寻求間欧洲以外的（首先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党和革命运动进行更广泛的接触，我們认为今天必須更好地研究它們的問題和要求，也許它們也有兴趣了解一部分我們的經驗。

另外，我們认为，在提出了一些共同的重大問題和斗爭任务的世界某些地区中工作的党进行接触、会見、合作是非常有益的，正象在西欧（1959年十七个党會議）所作的初次嘗試表明的那樣。而在这方面，很可能需要达成更正規化的协商和協作形式。特别是对于我們來說，我們將为在欧洲共同市場和整个資本主义欧洲范围內实现这些形式而繼續努力。

我們懂得，在一定的时刻，为了共同丰富对国际形势的估計并使之更为深刻、确定我們世界战略的基本內容或者为了解决具体問題而举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會議所具有的特殊

意义。但是，召开會議的主要問題在于，要研究會議对于发展对形势的分析和制訂共同方針并得出明确結論以及对于使运动的团結有所进展所提供的实际可能性。因此，使这些會議开得有益处和有成效的重要条件就是：會議召开的时刻、适当的准备、对打算解决的問題和可能以及应当达到的目标的明确和现实主义的看法。

关于在最近举行一次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是否适宜的問題，鉴于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的形势，我們党认为有必要表示保留意見。事实上，这样一种性质的會議，今天可能会面临在两种对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害的解决办法中作一选择：要么进一步加深目前分歧甚至破裂，要么达成一个完全形式上的和完全不令人滿意的妥协。几乎可以肯定，它将不可能客观地解决目前出現的那些与分析形势和制訂方針有关的新問題，从而向我們运动更巩固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結迈出那怕是局部的、然而有效的一步。而今天应当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这就要求創造目前好象还不存在的某些条件和可能性，并且要求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这一道路上前进，并且更广泛地說，为了各国共产党之間辯論的充分开展，特別重要的是討論的方法和語調也应当不要加剧分歧，不要导致四分五裂和决裂，而要有利于真正地、客观地比較各种立場。

当然，看不到在目前条件下正在进行的关于分歧的辯論和爭取一条正确政治路綫的斗争不可能沒有激烈論战的現象，那在今天完全是烏托邦。但是，中国同志对其他共产党和对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过去作出了、今天也正在作出最大貢獻的党——首先进行的謾罵、詛咒、指責背叛是另一回事，应当坚决予以譴責。中国同志所进行

的分裂主义的呼吁和行动、不能允許的派系活动是另一回事；对其他党的論点和路綫任意进行歪曲是另一回事，也同样应当予以譴責，而这似乎已經变成了中国同志論战的慣常手法，他們正是以这种手法对我们党进行攻击和誣蔑的。最后，論战竟然加剧到影响和損害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某些国家关系这一事实，是令人极其不安的。

我們党过去参加了、現在打算更积极地参加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辯論，我們党过去努力并将永远努力避免使論战加剧和墮落的一切形式。我們將始終如一地、最坚决地維護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思想及政治方針，我們全体同志的斗争和經驗所取得的財富，最明确地拒絕和駁斥中国同志的攻击和錯誤立場；我們將繼續尽一切可能使討論在各国共产党之間应当有的友好、諒解、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

3. 这些年来，即使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在目前面对同中国同志开展的論战中，我們党都是善于进行热烈的、民主的、負責任的辯論的；并且善于坚决地和胜利地回击和拒絕敌人的投机和进攻、那些妄图使我們党脱离正确政治路綫走向宗派主义或机会主义立場的人們以及那些在我們队伍中散播不信任和进行瓦解的人們的行动。

越来越多的同志曾致力于深入研究党的政治路綫，了解其实质，他們不仅通过思考，而且通过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經驗。这样，使党获得了更加富有批判能力和成熟的革命認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向我们党也提出来的那些复杂的新問題，有以上种种成果作基础，应当推动我們去克服习惯立場上的一切懶惰和迟緩現象，以便在各个活动領域中——理論和文化的、政治和实践的——充分發揮积极性、革命干劲和热情。

談到我們願意为正在进行的辯論和斗争作出的那种自主的

貢獻，我們將繼續進行工作和探討，從思想上和政治上來使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路綫更加深化。我們將以西歐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整個世界戰略方面能夠而且應當起的作用這一重大問題作為我們參加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辯論和我們在国际方面的全部倡議的中心主題。

但是，顯然，象我們黨這樣一個革命的、民主的和人民的偉大力量，必須對世界革命戰略的制訂和實行這些重大問題作出貢獻，這種貢獻不僅是對辯論作出的貢獻；同時，它首先是在鬥爭、成就、前進和成果上的貢獻，這將在事實上證明我們為我們國家所提出的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是有效的。因此，更緊密地把我們隊伍中正在進行的辯論同我們在國內的倡議，同我們爭取和平和爭取外交政策及整個意大利政策的新方針的鬥爭，同我們與人民群眾以及一切工人和民主力量的會談和關於與他們進行更廣泛接觸的探討聯繫起來，是很重要的。

在開始籌備我們的全國組織會議這一期間，我們應當從已展開的辯論中吸取新的推動力，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加強黨，擴大黨的組織力量並使其活動得更好，發揚黨內民主，同時，鞏固我們隊伍的政治統一、緊密團結和紀律。

羅馬 1963年10月24日

（譯自1963年10月26日意大利《團結報》）

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貿易情况

朱塞佩·博法

中国和欧洲社会主义各国的經濟关系受到政治分歧的剧烈影响,近年来甚至削減到十分微小的程度。如果說,中国同苏联貿易的削減是特別明显的話(因为过去在这方面貨物交易最多),这种削減也同样地、甚至相对地說更加严重地触及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貿易(唯有阿尔巴尼亚完全例外)。

这种挫折有政治背景是毫无疑問的。1949至1959年的十年中,貿易关系曾經不断上升,大有不可阻擋之势。大約从1960年开始,貿易关系开始下降,最近两年来急剧下降到极低的数目,因此,它同思想政治分歧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但仍值得說明这种現象的某些在經濟上最典型的方面。

讓我們来看看数字吧。中苏交易在1959年达到最高峰,总值是十八亿五千万卢布。自那时以来,中苏交易就下降了,1962年的总值是六亿七千五百万卢布;仅仅三年就驟減了三分之二。这一切使人們預料到,1963年还会繼續削減。苏方出口遭受的打击比进口更大;目前,前者是1959年的四分之一,而后者是1959年的一半。事实上,急剧削減到几乎微不足道的水平的是苏方工业設備的供应;目前这种供应相当于四年前的四十分之一。

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貿易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例如,中波貿易1959年达到最高水平:四亿三千四百万茲罗提。随后开始下降,最初是不規則的,几乎是不易觉察的,后

来則急轉直下：1962年交易总共才有一亿五千一百万茲罗提。中捷貿易縮減得更加厉害。

双方曾就这种現象的原因进行論战。中国人責备苏联人片面違反了簽署的協定。但是，总的說来，中国迄今还未說明指的是哪些協定；他們只举出一件事——1960年苏联技术人員的撤走。苏联人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都反駁說：供应的削減是中国方面公开要求的。

捷克人还說，他們曾經向中国提供优惠条件，只要保持某些交易，然而遭到了拒絕。德国人甚至說，一位中国领导人曾對他們說，从今以后，中国将只同那些贊成它的政治思想論点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經濟关系。

因此，問題在于存心要处于孤立，这正是各国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的表現。換言之，某种“一国内建設社会主义”的論点，即使目前已經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

但是，分析一下上述数字，也可以看出：这种貿易驟減也反映出——或許特別反映出——中国經濟所发生的动蕩。1958至1960年間，尽管政治分歧业已存在，貿易的下降还是受到很大的节制的。1958至1959年即最典型的“大跃进”时期，尽管莫斯科对这样一个举动抱有怀疑，但中国同苏联的貿易关系仍旧有显著的增长；中国在那一年內购买的苏联工业設備一下子增加一倍。同波兰也是如此，即使总的來說两国之間的貿易已經有了一定的削減。这证明：当中国人以为当真能够实现由“跃进”所規定的那些非凡的发展計劃时，它就伸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它所需要的机器。

正是在那些計劃破产的时候，貿易也瓦解了。交易最触目惊心地下降的年份是1961年；但这一年也是中国經濟最糟糕的一年，困难最大的一年。工业化停頓下来。业已簽訂的向別国

购买貨物的合同被取消了。不錯，后来中国经济开始慢慢恢复，今天一些外国观察家也看到了这点。但这种恢复伴随着一条同先前根本不同的经济方针，因为它给农业以绝对优先地位，因而留给购买工业设备（这是十年来贸易发展的特征）的余地就很小了。

贸易下降对双方都有消极的影响。其他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供应是对中国工业化的主要贡献之一。由苏联人建设的两百个现代化企业现在还是中国最优良工业的骨干，因此这种供应的停止阻碍或延缓（中国）工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中国订货突然停止，特别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些国家具有极不愉快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可能产生用中国的贸易中断来解释经济困难的倾向，而这种经济困难还是有其他原因的；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失，并且是相当严重的损失，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尽管从经济利益出发，有足够理由来恢复贸易，但看来今天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政治冲突依然十分尖锐。中国“以自力更生为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似乎并不那么有助于贸易的新发展。最后，中国的经济方针也极不明确。

北京总把现阶段说成是“调整阶段”，这是什么东西的前奏呢？是恢复按比例有计划做法的前奏呢？还是再来一个“跃进”呢？因为可能令人担心的是仍旧采取（即使仅仅是形式上采取）那类口号，以及那种为北京某些经济学家所珍贵的、“波浪式”或“跃进式”发展的理论。或者是宁愿长期给农业以优先地位以便为工业化慢慢积累资金吧？也就是说，采取一种“布哈林”式的方针，而先前主要是一种“托洛茨基”式的方针（我们用这些词是为了扼要说明，并无贬意）。迄今没有一个观察家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中国领导人自己就没有说明。对上述问题如此不

明确,即使沒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也无助于貿易的恢复。

在这点上,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是交織在一起的。过去中国人突然选择与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針,这一事实对于后来的論战发生了影响。今天这种影响还未消失。

(譯自 1963 年 10 月 30 日意大利《团结报》)

苏联共产党的斗争的 世界作用和意义

路易吉·隆哥

我认为,在目前时刻,有必要再一次哪怕是最一般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曾经起过的和正在起着的巨大的和不可比拟的作用。

这个党是列宁所创立和锻造出来的,并且在第一个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受到过锻炼;这个党四十六年来领导着第一个工农国家,这个国家对各国人民来说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自由和斗争的榜样,它粉碎了法西斯匪军,并且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个党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经开始从社会主义向“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党高高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并以最宝贵的列宁主义学说丰富了它,使这面旗帜成了联合世界一切为争取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而斗争的力量的中心;这个党过去和现在一向用思想和行动给人类指出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可靠前景。

不能忘记,在近五十年来的急剧的和充满各种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判定方向,并不永远是很容易的。正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担当起了粉碎资本主义锁链、沿着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经过艰难和空前的困苦建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劳动,社会主义实际上体现为一种新的政

治、社会和經濟制度，变成了国家力量，并且表现在国际政策中，它决定了各国工人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意識发展中的飞跃，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面貌，而且改变了历史进程。

布尔什維克的学說和范例推动了資本主义国家和某些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階級先鋒队去建立以新的政治和組織原則为基础的共产党。但是，由于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平衡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同时展开的，也不是根据事先拟定好的公式发展起来的。因国内战争变成一片廢墟和因經濟破坏而削弱了的苏維埃国家，只得一个国家抵抗外国的干涉。在打退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以后，在国内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开始实行新經濟政策。在列宁的领导下，党制訂了彻底改造国家的計劃——建設社会主义的計劃。但是，面对着資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和在新經濟政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提出在一个国家內不仅展开而且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呢？

这是一个大問題，党根据列宁的指示，对这一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以事实 and 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尖銳論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原有的技术水平和經濟水平是很低的，包围着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資本主义世界的进攻是接連不断的和阴險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階級斗争在这些年代具有特別尖銳的形式。正如列宁所預見到的，在俄国，开始革命是容易的，但把它繼續下去却困难得多。

布尔什維克党担負起了自己的任务。它坚决地克服了一切反抗、动摇和困难，而苏联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內，在沒有外援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业强国，摆脱了对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上的依附，改造了經濟关系和农民的全部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建成包括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文化革命。絕大多数曾經是文盲的劳动群众已經实现了向文化和科学的高峰的巨大的跃

进。苏联一百多个大小民族不仅得到了承认和得到了对它们的特点的尊重，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而且也摆脱了沙皇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过渡到社会主义，达到了繁荣昌盛，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民族越过了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这些巨大的成就，苏联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威力和国防能力，提高了自己在全世界的威信和影响。

苏联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和牺牲，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找到建设新社会的最适当的形式和方法而开展的劳动和不倦探索。它建成了新社会，并且开拓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充满阴险的陷阱和困难的道路。可能，这就是在如此困难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犯错误和采取过火行为的原因。但是，尽管斯大林的领导犯了错误，尽管它为了克服抵制和粉碎敌人而采取的措施是残酷的，可是新的苏维埃现实的阶级内容、它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涵义并没有改变。

事实证明，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断言相反，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并不意味着在考察世界革命问题上的什么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闭关自守的表现。相反，这条路线使苏联能够在经济方面迅速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并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力量用于保卫和平和自由。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取得成就，苏联的活动在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自由的斗争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和威望。的确，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能够站在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前头。

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强了它在被殖民主义奴役的国家里的活动，并且扩大了争取和平、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不仅在

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力量之間，而且在所有和平拥护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之間，在所有民主主义者之間，統一行动的路綫，又重新得到证实和发展，并且适应了新的可能性和要求。这条路綫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說明和发展，成了許多国家建立人民陣綫的基础和大力动员全世界各国人民保卫共和制的西班牙的力量，当时西班牙遭到德意法西斯纵容的叛乱将領的进攻，它仅仅得到苏維埃国家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实际支持。对共和制的西班牙的援助是实现反法西斯的人民、政党和国家的大团結的第一个实际榜样；是实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規定的团結的第一个实际榜样；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广泛地表現出来的并成为战胜法西斯的基础的联合的榜样。

苏联在粉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軍国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把人类从法西斯的奴役下拯救了出来。由于苏联的参加而取得的軍事上的胜利，为一系列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人民推翻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权創造了有利的条件。战后有許多新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革命也在中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这种急速的胜利給了帝国主义陣地以新的打击。現在，社会主义不仅在一个国家里，而且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里繁荣起来，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它們組成一个由共同利益和目标、由社会主义团結的紧密联系联合起来的有主权和自由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社会共同体。这种团結是使它們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面前得到安全的保证。苏联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援助，使它們在最短的时期內克服了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所造成的貧困。

人民民主国家积累了新的政治經驗，这包含着社会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形式上的許多新的和独特的因素。这些經驗反映了

在帝国主义削弱和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特点。这些新的經驗集中地反映了每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

但是，这些新的經驗也证实了十月革命的基本教訓和苏联經驗的有效性：（1）只有政权掌握在劳动階級手中，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2）只有同非无产階級劳动群众結成紧密的联盟，才能使工人階級起到其創造新社会的作用；（3）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組織和联合群众，对文化和經濟建設实现有計劃的領導，保证維護革命的果实。

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成了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自由的最牢固的堡垒。它們的活动有利于全世界結構的革新，有利于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和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現在，在世界范围内，已經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毫无疑问，世界舞台上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形成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軍事冒险的危险性就越来越减少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在爭取达到这一成就方面曾經起过并且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产生了影响，而且是由于它的指导作用导致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符合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符合国际无产階級和全人类的利益。

我們已經說过，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和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历史条件本身实际上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那种范例和国际領導者的作用，使得在斯大林領導时期不可能避免錯誤、歪曲和过火行为。开展这种工作和履行这种領導职能时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促进了权力的过度集中。但是，在这些客观条件不再存在的时候，在这种集中与成熟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抵触的时

候，权力的过度集中却仍然保存下来，甚至加强了。斯大林过低地估計了客观条件，使一切都以主观因素，以领导人和基层組織的才能、方針和忠誠为轉移。

反对階級敌人的斗争从而轉到了党内，轉到反对“怠工”和“变节”。政权从而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的手里；行政命令方法占了上风。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常常成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牺牲品，而整个政治工作的歌功頌德做法妨碍了对苏維埃社会发展所提出的现实問題的認識，从而削弱党的巩固性和战斗力。誠然，斯大林领导的錯誤和局限性从来没有触犯到革命过程的基础，沒有改变它在世界事件进程中的意义，但是，它們使革命进程的发展貧困化和受到束縛，这对社会主义建設进程，对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对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創造能力和对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特殊問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斯大林在世时，任何分歧都变成不可調和的矛盾，变成“放弃”原則，变成决裂。如果任何分歧都变成决裂，那就沒有討論的可能。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的发展要求公开地討論，自由地交換意見，不断地进行探索。因此，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活动同客观现实不断联系的条件，是克服錯誤的条件，也是正确發揮民主集中制职能的条件。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間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条件。共产党正是以思想和行动、討論和实践活动的密切一致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就其本性來說是斗争和革命行动的党。葛兰西警告說：“行动中的毫不妥协的原則性自然要以決議前的討論中的忍耐性为前提”。

具有特別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正是苏联共产党自己主动提出譴責和克服斯大林时期的錯誤和歪曲，并推动了这一活动。正是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最尖銳的形式揭露了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推动了严格尊重社会主义法制和扩大民主的斗争，从而证明了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能够承认自身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在内部克服掉它们，同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取得鼓舞力量。

的确，列宁写道：“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①

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谴责，是苏联共产党对恢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及进一步发展这些原则的巨大贡献。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批判工作开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和革新的时期，在各国共产党内激起了一个纠正、进行新的探索的过程，使得它们能够消灭公式化和宗派主义的立场，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和革命行动的新的可能性。总之，提高了共产党的创造力，加深并且丰富了——在同现实活生生的联系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这一批判、研究和丰富的工作，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纲领性文件，即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共同制定和一致同意的文件产生了。

根据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以及莫斯科代表会议的文獻，共产党人认为，把苏联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那种方法和解决办法作为唯一的模型，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一种有害的趋势。其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

实,这种看法反映出了列宁的确切的指示,列宁在1908年就告誡說:“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里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发展。……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带进总的潮流里来……”^①

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章中,从自己同左倾宗派主义的論战中做出了共同的結論,例如,从这一章中可以讀到:“……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維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細节上把这些原則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統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②

194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指出:“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途径极不相同,由于它們的社会制度性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由于它們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不同,以及由于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組織程度不同,因而各个国家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務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正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形势为繼續前进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途径的时候,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采取这条新的途径的标志就是进行新的政治上的探討和概括,展开广泛的群众性行动。对向革命过渡和接近的新形式的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頁。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74頁。

探索,表现为爭取新型民主的斗争,体现在某些国家的人民民主中,在那些国家,政权已轉到在爱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中形成的人民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联盟的手中。換句話說,夺取政权时采取了不同于苏联的形式,利用了那种同苏联經驗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的方法,而且依靠了同苏联經驗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的力量結合。

在譴責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苏联共产党主动拒絕任何关于“领导”国和“领导”党的概念,可以說,这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合乎邏輯的发展。这絕不意味着否认和低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在全世界曾經起过并正在起着的那种无容爭辯的作用。这只是意味着強調所有共产党的平等,強調这些党在制定政治立場、实际行动、組織形式和党内形式方面的完全独立,它們的政治立場、实际行动、組織形式和党内形式要符合本国的独特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传统、生活的民主形式、以及这些国家內提出的直接任务,同时要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取得紧密的团結和思想上的一致。

* * *

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产生、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所造成的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出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形式、出現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組織和实现政权的新方式的可能性加大了。

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中写道:“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陣綫和人民陣綫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協議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結起来,不經過內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資料轉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依

靠人民的大多数，并且坚决打击那些对于资本家和地主不肯放弃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各个领域的大垄断组织正在践踏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垄断组织的压迫不仅对劳动阶级而且对其他所有居民阶层来说，都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在这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工人、农民群众和城市中等阶层的广泛的和不间断的运动，反对大垄断资本，反对它的反动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民主和实现我们所说的深刻的结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有可能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建立起紧密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以便使前者影响后者，并开始进行一连串过渡性的运动和改造，逐步改变力量的对比，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用革命的办法取得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导作好准备。这样一来，反垄断资本的斗争、争取结构改革和民主的斗争，就成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把这种斗争形式和那种斗争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一方面有效地抵制忽视并摈弃社会主义前景的改良主义，另一方面有效地抵制只是口头上肯定这种前景但不能为实现它进行任何有效的和群众性的政治活动的极端教条主义。

在莫斯科会议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的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所通过的文件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这些文件警告说，在新的条件下，不能忘记列宁关于统治阶级不会自愿地交出政权的指示。正如苏共纲领

所写的，很明显，“工人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是否能获得成功，将取决于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对斗争的一切形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议会的和非议会的——掌握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对于最迅速地 and 突然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有怎样的准备”。

在一系列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人主张通过民主的和和平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避免起义和国内战争，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总是准备采取暴力，以便堵塞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但是共产党人认为，正是开展工人、全体人民群众的运动和斗争，才有可能使反动势力瘫痪，并且在它们采取暴力的时候，在战场上孤立和粉碎它们。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当代在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的要求和任务所作的决议，对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这些问题是：关于战争由于热核武器骇人听闻的破坏力而具有的性质（就后果来说）；关于防止这种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含在已经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关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必要性；关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所有民主主义者和和平拥护者为了建立没有武器和没有战争的世界所理应完成的任务。

首先，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决议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制订文件时曾被用来作为基础，后来又体现在苏共纲领中）粉碎了某些阶层依然保存着的幼稚的和荒唐的希望，即希望革命可以不通过每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不通过每个国家本身矛盾的尖锐化，不管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不管统治阶级的抵抗程度，而从外部——或者是通过社会主义国

家的压力,或者是通过战争——来实现。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莫斯科国际会议的功绩是,它们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了反对“革命输出”特别是“反革命输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1960年通过的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中写道:“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年代。”而苏共纲领再一次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认为,现在也不认为,走向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和战争相联系……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可以不经过世界战争而实现。”

苏共在自己的纲领中声明说,它认为“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保证和平条件,并且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使人类免遭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段话证实了苏联从它诞生以来所遵循的传统政策。我们都记得,它一产生就向“一切一切的人”发出了和平的号召。但是,今天苏联的和平政策是在反对战争的斗争具有新的力量、显现出更加可靠的前景的新条件下实行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实力的日益增长,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动员起来,已经使帝国主义者不能把两个体系的竞赛转到军事轨道上去,不能把这种竞赛推到武装冲突和战争的道路上去。这是苏联及其共产党的和平政策的主要成果。但是,这也是世界上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某种变化的标志。当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没有改变。假如问题只取决于帝国主义者意志,那世界早就卷入了新的世界战争。但是,战争与和平已经不只是以帝国主义者专横为转移了。世界上已经出现能够打破他们的侵略计划、打消他们为称霸于世界而动用热

核武器願望的力量。

当然，新战争的危險并未消除，但是“苏維埃国家的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是实现人类多少世紀以来关于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战争的理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驟。在世界的社会主义部分，不存在对发动战争感兴趣的階級和社会集团。社会主义在許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門超过了資本主义，把制止帝国主义侵略的强有力的物质手段交給了爱好和平的人民”（苏共綱領）。近年来，正是由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存在和威力，各国人民才享受到和平的幸福。

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能不能避免战争呢？这是各国人民向自己提出的一个問題。苏联共产党回答說：“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階級以及一切拥护和平事业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日益增长的优势会造成这样一个結果：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苏共綱領）。

保证和平的道路要通过实行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軍；通过停止“冷战”，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政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議和政策內容就是这样。“和平共处要求：放弃把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間爭論問題的手段，通过談判来解决这些爭端；各国之間平等、互相諒解和信任，考虑相互的利益；不干涉內政，承认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独立解决本国一切問題的权利；严格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在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經濟和文化的合作”（苏共綱領）。苏联由于遵循和平共处的政策，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同美国和英国共同簽訂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

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條約。

大家知道，和平共處是兩個體系之間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之一。因此，它絕不是以在世界上保持社會政治原狀為目的。它被社會主義國家看作是旨在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體系在它同資本主義競賽中的陣地的活動的基礎。它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展開積極行動、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中工人階級取得進步和消滅大資產階級勢力與權力的一個有利的基礎。

蘇聯一向執行而且始終不渝地執行着和平共處政策。這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相互關係的唯一明智而正確的原則。要么兩個體系的和平共處，要么毀滅性的世界戰爭，這就是現時代所要做的抉擇。全世界共產黨人在八十個黨會議的聲明中承擔了捍衛和平共處、堅決為防止戰爭而鬥爭的義務。他們聲明說，今天，對於共產黨人，對於工人階級，對於全世界和平和民主力量來說，再沒有使人類免遭新的世界戰爭災難更迫切更偉大的任務了。

和平與和平共處為已經擺脫了帝國主義統治的各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清除世世代代的落后和貧困、取得完全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提供了極為優越的條件。帝國主義者力圖採取一切辦法來保持自己對前殖民地的控制，並繼續剝削它們。帝國主義者打着援助的招牌，通過新的形式和新的方法，企圖在這些國家中保持自己的陣地和奪取新的陣地。民族解放並不以取得政治獨立為限。取得政治獨立只是實現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深刻變革和解決民族復興的最迫切問題的起點。

偉大的十月革命、蘇聯各族人民的絕對平等的切實實現，喚醒了東方，把殖民地各國人民吸引到解放和民族獨立的偉大運動中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的產生，對於這個運動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這個運

动已經有可能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援助，得到世界工人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而在目前复杂而艰苦的发展阶段上，在已經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国家必須保卫已爭得的独立和沿着建設新的民族生活道路前进的时候，苏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是、現在仍旧是它們真誠的和可靠的朋友。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写道，“它們对这些国家在沿着进步道路向前发展方面，在建立本国工业，在发展和巩固民族經濟和培养本国干部方面給予大力的援助和支持，在爭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同这些国家合作。”

苏共从自己这方面声明說，它认为同已掙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羈絆的各国人民的兄弟联盟，是自己政策的基石之一。“苏共认为，援助沿着取得和巩固民族独立道路前进的各国人民，援助所有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进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苏共綱領）。

随着社会主义取得日新月异的胜利和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各国人民的团結日益加强。由于各个国家是在不同的時間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由于它們建設新生活的起点各有不同，因此各个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時間也就会有所不同。但是，也像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一样，第一个着手建設共产主义的国家正为其他国家开辟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使它們有可能利用新的經驗，縮短建設社会主义的期限，并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

因此，可以用苏共綱領上的一段話來說，“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符合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因为除了所有其他的以外，它还“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濟力量和国防能力，为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文化合作，为援助和支持这些国家創造越来越有利的可能性”。在苏联建成共产

主义，也将是“人类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向共产主义的光辉顶峰每迈进新的一步，都是对世界各国劳动群众的鼓舞，都是对各国人民争取摆脱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援，都将加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 * *

从对苏联共产党生活中的主要方面的简短评述中已经可以看出，它的斗争、它的范例、它的成果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它的伟大领袖列宁对丰富革命理论作出了极宝贵的和决定性的贡献；苏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是无疑的；它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激烈竞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时代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

所有这一切不仅早已为共产党人所认识到，而且也早已为善于评价历史进程的现实意义的全世界劳动者和民主主义者所认识到。这一点在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文件中不断地得到证实。中国共产党也像其他共产党一样，承认了这些事实，并在不久前签署了莫斯科国际会议的文件，这些文件根据对目前斗争条件的深入分析明确地表示承认这一切。

遗憾的是，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改变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开始在总的理论方针和政治方针方面以及在具体行动方面，向苏联共产党和一系列共产党提出骇人听闻和荒谬已极的指责。过去曾经同全世界共产党人一起欢迎和赞同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大转变的中国同志，现在竟诬蔑、攻击和斥责这种转变，而这种转变使苏共有可能摒弃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个人迷信给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歪曲和错误，克服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创造能力。苏共分析了国际形势因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成就而发生的变化，并

且指出了各个国家在现实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的可能性。

現在，中国的领导人把这种分析和指示說成是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說，尽管我們已經看到，这种分析和指示是这个学說在当前历史时代的最彻底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指責目前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以帝国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根本对立为基础的总路綫，是放弃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他們任意地和誹謗性地把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革命作用对立起来；他們认为，說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避免战争和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各国人民之間新的关系，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正如我們看到的，苏共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所制定的全部路綫都遭到中国同志的反对和指責。他們用对立場和論点的抽象的和恣意的对比来代替具体的分析。他們用攻击、歪曲、誹謗来代替对思想和經驗的客观对比。这样，中国同志就表明自己不願意注意决定革命运动道路的現时代的特点，他們发出一系列假革命的左派論調，这种論調不能不阻碍共产党去切实推进革命。

在中国同志們目前所提出的观念中，正百般縮小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忽視这样一些事实：站在現时代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基本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我們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今天这个体系成了一个可靠的盾牌，在它的掩护下，已經从殖民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或者正在爭取自己解放的各国人民可以保证自己的独立和順利地繼續进行自己的民族革命的过程。只有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紧密联合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才能取得完全的民族解放和摆脱帝国主义的經濟独立。

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中国同志还就迄今并未成为争论对象的一些问题粗暴地攻击了苏共的创造性路线，这就是：关于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的問題，关于苏共变为全民的党的問題。苏共纲领包含的所有这些论点，都是正确的，有根据的。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国内只剩下劳动阶级，需要对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包括社会上的所有阶级和阶层，对这些阶级和阶层来说，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变为全体人民的政治组织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再需要通过自己的专政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它通过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决定性地位，通过自己的威信和影响来实现自己的这种作用。成了全民的党的共产党也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中工人阶级是人民中最大的和最先进的一部分。

在个人迷信问题上，中国同志确实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在他们看来，对领导人的迷信似乎是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中的一点。这个转弯同要吹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作用、把他们推崇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权威的意图是联系着的。

但是，关于个人迷信的问题，不能归结为对斯大林或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评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范围要更为广泛，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这种建设是否将沿着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发展；指的是党的组织原则和生活原则，这些原则是否会保证所有的积极分子创造性地自觉地参与制订并执行政治路线。个人迷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群众、政党和领袖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不相容的。实际情况是，苏共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譴責了个人迷信，从而洗清了社会主义的面貌，去掉了斯大林所做的歪曲，并推动共产党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只有这样，只有在那些实现了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地方，才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尼·謝·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过，馬克思列宁主义始終严厉地譴責个人迷信的任何表现，认为这种表现是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同共产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把人民看作历史的真正創造者。他們強調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組織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不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領袖的重要作用，但是坚决反对吹捧某些个人，尤其反对神化某些个人。吹捧一个人，不可避免地会把人民和党推到次要地位，貶低人民和党的作用和意义。

正是依靠譴責个人迷信，苏共才在自己最近的代表大会上制訂了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決議，并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自己的第三个綱領（第一个綱領是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二个綱領是在1919年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建設綱領。赫魯曉夫同志在报告中就这个問題說道：“綱領草案标志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論发展中的新阶段。綱領对于爭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一切理論上与实践上的根本問題以及現代世界发展中最重要問題都給予明确的回答。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解决党和苏維埃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基本問題，对分析世界发展的过程，提供了許多原則性的新东西，这两次代表大会对綱領草案的拟定有着巨大的、真正历史性的意义。”

在新的綱領中，苏联共产党担负着这样的义务：今后仍将加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的兄弟般的联系，“……使自己的行动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个队伍的努力协调一致，以便为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为劳动者的利益、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这种义务，也像苏联共产党曾经担负过的其他所有义务一样，无疑将得到履行。这些义务使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努力和斗争也将以胜利而告终。

（译自1963年11月《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在南斯拉夫的訪問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接触虽然短暂，但这次接触引导我们不仅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组织，而且就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及其最近的历史和当代某些主要问题进行了思考。我们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1948年弄得滿城风雨的絕裂問題上，以及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工人自治制度引起的有时尖锐的爭論上。但是，这两个时期之間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也許是今天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题目，因为，研究这个问题可使人作出全面的考虑和得出全面的結論。

关于1948年决裂的原因和情况，已經談得很多，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已完全清楚了。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說来，他們采取这种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他們对团结和紀律所持的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团结和紀律曾經在将近三十年中是我们的运动的特点。在共产国际解散后，面对着与过去那么不相同的任务和每个国家的任务也各不相同的局面，并没有去寻求能够和应当保障团结和紀律的办法。当时沒有經過討論就同意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在西班牙和大战期間熟悉南斯拉夫同志的共产党人，当时并不相信那些荒唐的、警察局式的誣蔑，人們后来說，这些誣蔑是貝利亚捏造的。但是，这些誣蔑流传着，并在凡是我們执政的地方形成了后来证明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方针，特别是对某些党來說更是如此。并且，最糟的是，1948—1949年的决裂和論战（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决定了

許多國家中我們運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發展的停頓。

至於斯大林以及他提出的為其他所有人所接受的創議，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了，還沒有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可以肯定，斯大林不了解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是多麼嚴肅和鞏固，它同南斯拉夫人民群眾的關係是多麼深厚。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是在判斷在全世界各國人民歷史中有深遠根源的事實和環境方面的官僚主義膚淺性的表現。然而這個錯誤並不能說明決裂的深刻原因。我認為，應當從每個國家的內部發展和國際局勢中，從看待戰後所誕生的人民民主政權的現實情況和遠景的方法中，去尋求這些原因。

值得提一下，戰後不久便曾經就構成這些政權實質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新東西開始進行了有趣的研究。研究後來中斷了，一切都是以學究式的公式解決的，即：人民民主只是象蘇聯實行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同義詞”。這一來，現時代向工人運動提出的最大的歷史問題：即探求新的主客觀條件所需求並且提出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創造民主進步政權的新形式、同時以新方式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就幾乎縮小為一個術語問題了。人們今天不能避免這些問題的提出，也不能避而不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都表現得清清楚楚了。但是，人們錯過了許多時間，犯了本可避免的錯誤。

人們當然也不能忘記，1948年，冷戰已經對人民民主制度和蘇聯發動了。國際前途茫茫。採取許多步驟、許多嚴厲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更難以說明為什麼斯大林恰恰就在此時此刻挑起同南斯拉夫國家和南斯拉夫人民的、人們當時不能料到全部後果的破裂。因此，實際上問題是，怎樣看待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互關係的問題，是它們之間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國際團結問題，以及它們的必需和不可缺少的獨立自主問題。在

新民主国家間的关系中,以及在它們同苏联的关系中,这个問題在 1948 年前就遇到过和討論过了,但討論的情况尚沒有被人們所充分了解,以致未能从中得出結論。不能否认,苏联在解放战争取得巨大軍事胜利都归功于斯大林。大概是他把全部功績归于自己,并且认为,此后他可以所欲为了。

然而,照我看,人們似乎又可以肯定說,在 1948 年破裂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还远未制定一項关于在他們国家建設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特理論。战后馬上出現的严重困难和匱乏,不可避免地迫使建立一个权力十分集中的組織和領導。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遵照苏联的榜样迈出了最初的几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向前进,两个主要因素推动人們去研究新事物。一个因素是,同人民群众的极密切的联系,这些人民群众大多数在战争期間都是支持共产党人的,并且本着主动精神,准备在民主新基础上积极参加經濟建設。另一个因素是 1948 年的破裂造成的困难本身,这种困难迫使人們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以新的方式来寻求和利用經濟发展的一切可能性。这两个因素結合的結果,必然使关于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前进道路的探討获得成就。由于在极困难时刻沒有气餒,由于很好地抵御了威胁和花言巧語,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前景,这些成就的功績应归于南斯拉夫同志。

因此在 1956 年采取的和解行动之后的討論中,他們从来不願意放弃他們已經采取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虽然在这些主张的发展过程中,他們曾經明确了一些过去忽略了的問題,糾正了过火地方和錯誤,更好地发展了整个制度。

今天,我不认为,南斯拉夫同志用来解决他們的經濟和国家問題的道路应当也被看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須采取的道路。这样看是不对的。这将意味再一次重复公式主义和形式化的錯

誤。在我看来，相反地，指出作为他們經驗特点的那些主要点是有用的。在政治組織方面，我們永远不要忘记，他們的建設是以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贏得的絕大多数人民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基础的。国家組織的职能就是以这种无可置辯的现实为基础的。在經濟方面，独特的地方一方面在于通过工人自治制度把民主原則运用到一切新的經濟机构中去；另一方面在于一种规划方法，这种方法不論在国内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关系上都并不取消市場和市場法則，它正視錯綜复杂的现实，而这一现实应当是仔細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不应当隱瞞这点；在所有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劳动階級以积极的、建設性的方式推进了他們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論是經濟发展和民主形式之間的关系問題，还是市場制度下的經濟规划可能性問題，都是已經提出了的或者将会提出来的問題。

因此，必須毫不犹豫地拒絕中国人进行的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喧囂的論战。人們指責他們的東西（即他們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理論和实践中，对某些东西进行了革新），倒是一个可喜的錯誤，如果我們希望向前迈进的話，我們大家也都应当多少犯一犯这种錯誤。而且，这正是中国同志自己在过去也曾善于作的。人們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攻击，是在南斯拉夫由于它独有的政治倡議而成功地博得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之后特別开展的。然而，人們不能否认，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倡議是有益的，其种种后果有利于各国人民之間的相互諒解、国际局势的緩和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扩大和日益强大，应当习惯于这样的想法：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活动将会比以前更加丰富多采地进行和发展。人們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仅仅降低为一个不管是軍事还是政治的集团。在爭取积极和平共处斗争和建設一个新社会的重大路綫方面，态度和

創議的多样化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团结的。如果人们希望在这个正在一切大陆和各方面那么迅速地改变着的世界里，获得威望、获得承认和越来越多的支持的话，那末这甚至是应当走的道路之一。

（译自 1964 年 2 月 1 日意大利《再生》周刊）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五次全国 會議上的講話(节譯)

我們拒絕中国同志提出的狹隘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場,以及他們对我党政治路綫提出的批評。根据这些批評,我們告訴中国同志說:我們采取的是我們认为是革命的立場,因为这种立場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派你們的代表团来意大利吧,同我們进行辯論,看看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发表你們的意見。中国同志拒絕了这一建議。

近来,中国同志犯了一个极严重的錯誤,那就是批評和拒絕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的、以及后来为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国家所签署的禁止核試驗协定。我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錯誤,使得每一个人、甚至抱着一些怀疑的人看到,中国同志在这方面的政策是錯誤的。最近,周恩来同志去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訪問,他說了一些話,我們怀着一定的兴趣注意到,这些講話十分有利于緩和的政策。我們注意到,中国同志在他們的文章中爭論不休地竭力維護的某些意識形态上的立場,同承认某些现实这两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我們注意到,中国同志也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他們过去一向在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中工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所持的态度。我这样說并不是要指責中国同志犯有修正主义,但是我要說的是,他們考虑的是他們国家的现实,他們改变了这种应予以糾正和更改的现实。

我們认为,必須防止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斗爭因而走着不同道路的那些共产党之間的分

歧加深。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条件也是不同的，但是它們都有一个唯一的基础：它們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人民的国家，它們是资产阶级已不再执政的国家。由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譴責中国同志进行論战的方式，这种方式使这一論战降低到爭吵和分裂行动的水平。

我們认为，現在在世界各共产党部分同志之間存在的分歧必須克服，尤其是必須維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工人和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爭取取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的成就。

在目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說有必要召开一次像1960年會議那样的會議，以便討論这个問題和得出某些結論。我們中央委员会对于召开这样一次會議的主张迷惑不解。这是由于担心这样一次會議很难达到目的，而會議的目的必須是至少取得最低限度的团结，从而容許展开辯論，以便避免破裂、分裂和爭吵。

我們的迷惑不解是由于担心召开一次接受两种相对立的政策の會議不会有助于建立团结，相反可能加深某些集团所希望的分裂。我們反对召开这样一次国际會議的建議，而主张由一些党，特别是面临类似問題的一些党进行接触和会晤，这些会晤将有可能制訂出一种包含共同因素和差异因素的政治路綫，特别是在我們現在面临的問題上，这些問題就是爭取和平的斗争問題、可以采取的爭取緩和世界不同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問題，西方国家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問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西欧工人阶级运动和最近才从殖民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各国的各种运动之間的联系問題。召开會議問題将提交中央委员会討論。

（譯自1964年3月17日意大利《团结报》）